

## 隱蔽出擊抑或消極避戰——國軍第三戰區 面對浙贛會戰的部署與肆應

張世瑛

### 摘 要

發生在1942年5-9月的浙贛會戰，可說是自珍珠港事變至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前中日兩國在中國境內，作戰區域最廣、戰役時間最長、雙方出動兵力最多的一場會戰，然而此役一直未受到研究者的太多關注。截至目前為止針對此役的研究，都集中在會戰中的衢州戰役與蔣中正的領導指揮，卻忽略了衢州戰役前的金華蘭谿戰役及其後的浙贛路打通作戰，以及實際肩負會戰成敗之責的「第三戰區」的角色。本文試圖在既有成果的基礎上，探討第三戰區面對此役究竟是如何部署、指揮、肆應及自我檢討。

在浙贛會戰前，第三戰區已長期沒有大規模的戰事出現，日軍發動浙贛會戰的三個主要作戰目的為：1.擊潰第三戰區國軍部隊的有生力量；2.摧毀浙江省內的空軍基地，以阻止美軍利用空襲日本本土；3.奪取鐵軌、螢石等重要戰略軍需物資，這些目的均在沒有太大阻礙下完成。以往研究形成兩個對立觀點：大陸方面研究多批評蔣中正一再變更戰略、臨時放棄決戰，認為其只想要避戰以保存實力；臺灣方面研究則多肯定第三戰區在蔣中正避免決戰、保存戰力、襲擾日軍的指示下，改採隱蔽出擊的戰法，順利達成浙贛會戰所預設的避敵鋒芒、伺機反擊的作戰目標。然而從作戰過程來看，國軍顯然是隱蔽有餘、出擊不足，但更大的原因在於國軍受限於組織、訓練及觀念，除少數部隊外根本無法有效執行隱蔽出擊的任務。此役由於日軍在取得預定戰果後迅速退回原陣地，國軍對外宣稱收復所有失土，帳面上看來損失不大，因此對外掩飾了作戰不力的敗績。

關鍵詞：中日戰爭、第三戰區、顧祝同、蔣中正、浙贛會戰

# The Deployment and Response of the Third War Zone's Headquarters for the Battle of Zhejiang and Jiangxi Provinces

Shih-ying Chang\*

## Abstract

The of Zhejiang-Jiangxi Campaign, which lasted from May to September 1942, was one of the largest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after Pearl Harbor and before the Ichigo offensive in 1944. This important episode of the war, however, has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scholarly attention. To this date most studies related to the campaign have focused on the Battle of Quzhou and Chiang Kai-shek's direction of that battle, while ignoring the battle of Jinhua-Lanxi prior to it, the battles along the Zhejiang-Jiangxi Railway following it, as well as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s Third War Zone which shouldered the actual responsibilities of conducting the campaign. The present article intends to amend this weakness in existing scholarship by examining the deployment, response and post-campaign reviews of the Third War Zone during the entire campaign.

The Third War Zone had not experienced major military operations for quite some time before the Campaign of Zhejiang and Jiangxi. In 1942, the Japanese decided to launch this offensive in hopes of accomplishing three objectives: 1) to eliminate the Nationalist effectives in the Third War Zone; 2) to destroy the airfields in Zhejiang Province so as to prevent the Americans from using them in attacking Japan; and 3) to seize critical strategic materials such as railway tracks and fluorite. They accomplished all of these without much difficulty in the campaign. Two distinct views emerge in the current scholarship on this operation.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generally criticize Chiang Kai-shek for his repeated changes in battle plans and for his decision to avoid confrontations with the Japanese, arguing that he was more concerned with preserving his military strength than with fighting the enemy. Studies in Taiwan, on the other hand, largely approve the handling of the campaign by the Third War Zone as it followed Chiang's order to avoid frontal conflicts, preserve military strength, and

---

\* Senior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harass the Japanese by making covert attacks. This, according to Taiwan scholars, had been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e Nationalists in the first place.

Upon closer observation,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Nationalist forces were mainly taking cover rather than launching attacks. Hampered by poor organization, insufficient training and a problematic mind-set, most of those forces were unable to conduct effective covert attacks. As the Japanese quickly withdrew upon achieving their campaign objectives, the Chinese recovered all of the lost territories. Both China and Japan therefore claimed to be the victor afterward,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 were able to cover up its many defeats during the campaign.

**Keywords:**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Third War Zone, Ku Chu-tung, Chiang Kai-shek, The Campaign of Zhejiang and Jiangxi

# 隱蔽出擊抑或消極避戰——國軍第三戰區 面對浙贛會戰的部署與肆應\*

張世瑛\*\*

## 壹、前言

研究大陸時期中國國民黨史的開拓者——美籍學者易勞逸（Lloyd E. Eastman），從他的兩本重要著作的書名，一語道盡其對國民黨的評價，既然南京政權的建立是場「流產的革命」，那最終敗亡的命運，無疑也早已埋下「毀滅的種子」。<sup>1</sup> 然而，向來對國民政府鮮少讚譽的易勞逸，卻也為內外危局交迫下的國府，說了一句公道話：「如果歷史在1945年後對國民黨人更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地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描述為一篇大無畏犧牲的英雄史詩。……它在與一個在組織、訓練和裝備上，占有絕對優勢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

---

\* 本文係行政院科技部補助「抗戰時期的第三戰區——兼論國民政府的戰時軍事體制」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MOST 103-2410-H-292-002-）之部分研究成果。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修正意見，謹深致謝忱。

收稿日期：2020年3月16日；通過刊登日期：2020年9月4日。

\*\* 國史館修纂處纂修

<sup>1</sup>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八年，與法國（它對德國的抵抗在僅僅六個星期的戰鬥後便崩潰了）和英國（它從美國得到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比較起來，中國軍隊的抵抗是一個決心與自立的奇蹟。」<sup>2</sup>

然而，易勞逸也點出了一個至關重要、且讓國軍難以自圓其說的矛盾事實，1937至1941年間中國孤軍奮戰，面對中日軍力的懸殊對比，大概沒有幾個中國人想過，可以僅靠自己的力量擊敗強敵，戰爭如果要取得勝利，就得要把蘇俄、英國或美國等任何一國拖下水方能解套。但在內有強敵、外無援軍的情況下，抗戰的前半期，國軍反而有為有守，甚至打了不少漂亮的勝仗，如1938年的台兒莊大捷、1939年的第一次長沙會戰、1941年的上高會戰及第二次長沙會戰等；可自1942年起，中美英蘇盟邦共同並肩作戰，美國軍事援助陸續到來之際，抗戰的後半期絕大多數國軍像是生了不治之症的病患，幾乎再也不能進行任何有效的軍事行動，處於一種即將崩潰的先期狀態。<sup>3</sup> 究竟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什麼事情，當戰局終於露出希望的曙光之際，國軍反倒不堪再戰？

本文研究目的即是嘗試回應此一問題，並以1942年初至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前中日兩國在中國戰區境內，作戰區域最廣、戰役時間最長、雙方出動兵力最多的一場戰役——浙贛會戰進行個案分析，藉由國軍「第三戰區」在這場會戰中的部署、應戰及肆應等過程，論證珍珠港事變後的四年中，國軍內部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截至目前為止，絕大多數專門探討浙贛會戰的學術論文，多將視野集中在浙贛會戰中最關鍵的衢州決戰上，有關此一會戰的最新、也是最具洞察力的研究，係張力〈從決戰到棄守：浙贛會戰衢州戰役蔣介石的抉擇〉，充分利用了過去研究者殊少徵引、近年才公開的《蔣中正日記》及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

<sup>2</sup> 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p. 130.

<sup>3</sup> 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pp. 137-138, 156-157.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1912-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637. 本段譯文參見易勞逸（Lloyd E. Eastman）著，王建朝、王賢知譯，《蔣介石與蔣經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9年），頁165-166。

（以下簡稱「蔣檔」）等一手檔案史料。<sup>4</sup>然而，衢州戰役固然是浙贛會戰重中之重的一仗，但近五個月的浙贛會戰至少可分成三至四個不同階段，衢州戰役只是其中一役，過度強調衢州決戰的關鍵意義，忽略了開頭的金華蘭谿戰役及其後的浙贛路打通戰役，不免會有見樹不見林之疑慮。

至於歷來曾述及浙贛會戰的專書研究，泰半係戰史類的通論性著作，對於國軍在浙贛會戰中表現優劣的評斷，海峽兩岸戰史研究成果的看法與觀點，可說是涇渭分明。大陸方面的重要專著，從1990年代起即有張憲文主編，《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馬振犢，《慘勝：抗戰正面戰場大寫意》；楊樹標、梁敬明主編，《民族的苦難、民族的驕傲——抗日戰爭史新編》；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抗日戰爭史》（三卷本）；張憲文、張玉法主編，《中華民國專題史——抗日戰爭與戰時體制》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最新於2019年底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史》（八卷本）；以及專門針對浙贛會戰的完整研究，則有賴繼年〈浙贛會戰研究〉。<sup>5</sup>大陸方面的研究普遍認為浙贛會戰前夕，第三戰區司令部原本設定在金華前線進行決戰，然而甫一交戰，蔣中正即下達改在衢州進行決戰的指令，爾後又臨陣變計，放棄衢州決戰，指出戰略目標的率爾遽變，使得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及下轄部隊難以做出迅速調整，是導致失利的最主要原因。<sup>6</sup>對於蔣中正於是役領導指揮批評最烈者，直指蔣要為此役成敗負起最大責任，蔣錯在採取「消極避戰方針」，且全盤會戰部署「打法不當」，尤其「突然放棄衢州決戰是最大的錯誤」。<sup>7</sup>2015年彙

<sup>4</sup> 張力，〈從決戰到棄守：浙贛會戰衢州戰役蔣介石的抉擇〉，收入陳紅民主編，《中外學者論蔣介石》（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09-122。

<sup>5</sup> 賴繼年，〈浙贛會戰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作者並在學位論文的基礎上，近年來陸續發表了數篇有關浙贛會戰的論文如〈浙贛會戰新探〉，《抗日戰爭研究》，2011年第1期（2011年2月），頁63-71。

<sup>6</sup> 樓子芳、袁成毅，〈浙贛會戰：中國為盟軍承受的一次巨大報復〉，《浙江社會科學》，1994年第6期（1994年12月），頁55。文正再，〈論浙贛會戰及其影響—兼論中國戰場戰略反攻機遇的喪失〉，《萍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6年第1期（1996年3月），頁48-49。楊菁，〈寧紹戰役和浙贛會戰始末〉，《浙江檔案》，2005年第6期（2005年12月），頁21。

<sup>7</sup> 劉善慶，〈抗戰中期一次典型的消極避戰之役—浙贛會戰述評〉，《安徽史學》，2001年第4期（2001年7月），頁78-79。

集多位軍事史專家的《中國抗日戰爭史正面戰場作戰記》乙書更沿續此一觀點，明白點出「保存實力、消極抗戰」是浙贛會戰失敗的根本原因。<sup>8</sup> 從多篇論文直接以「消極避戰」為標題來看，顯見「消極避戰」可謂是大陸方面對於第三戰區國軍在浙贛會戰中表現的主流意見。

臺灣方面的軍事史研究者則完全不認同國軍在浙贛會戰中有任何消極避戰的意圖，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曾先後出版多卷本的《抗日戰史》、《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等系列戰史叢書，強調第三戰區國軍在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大戰略下，不受制於一城一地的得失，不但保留了國軍的有生力量，日軍最後亦退回了原陣地，國軍除金華一地外，並沒有增加其他失土，中日雙方在戰後回到如戰前般無異的對峙態勢。國軍史政單位對此役的戰史書寫還有一個特色，即從整個亞洲至太平洋戰場的總體戰角度，強調浙贛會戰共牽制了日軍十多萬兵力，使其無法抽調至同一時間的太平洋及緬甸戰場，對日軍而言，可說是得不償失，因此認為國軍在浙贛會戰中的犧牲，為盟軍爭取到極為寶貴的時間。即便是臺灣方面的最新研究，由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戰史新編——軍事作戰》乙書對此會戰的總結亦是：「此一作戰〔按：浙贛會戰〕對日本原有意發動的四川作戰產生牽制，日軍失去全面進攻四川之時機，又此戰之後，日本清鄉工作擴大，對其戰力造成負面影響。」<sup>9</sup> 雖對是役的評價重點容或不同，但大致上都肯定第三戰區國軍在最高統帥部避免決戰、保存戰力、隱蔽出擊、襲擾日軍的指示下，順利達成浙贛會戰所預設避敵鋒芒、伺機反攻的作戰目標。<sup>10</sup>

<sup>8</sup> 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下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頁1008。

<sup>9</sup> 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軍事作戰》（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260。

<sup>10</sup> 歐美學界針對抗戰史的最新力作則有劍橋大學方德萬（Hans Van de Ven）等人彙集歐美學者，以中日戰爭中的個別戰役為焦點，詳見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f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另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郭岱君亦主編有《重探抗戰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不過，這些歐美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都對浙贛會戰並無著墨。

本文即是在上述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試圖回應第三戰區國軍在浙贛會戰中所採取的作戰策略，究竟是一再消極避戰，坐等日軍最後退回原陣地？抑或是鑑於中日兩軍實力差距，避免正面決戰，改以隱蔽出擊、不斷襲擾的策略，迫使日軍無功而返？從表面上來看，這兩者間的差異極微，卻反映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應戰思維，不應一概而論，抹煞第三戰區國軍在浙贛會戰中的表現與成績。

在章節安排上，本文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探討日軍發動浙贛會戰的背景。在珍珠港事變前的中日戰爭，日軍發動攻勢的主要考量，僅限於中國戰場上的攻守情況，因此在武漢會戰後，原本處於戰事最前線的第三戰區，反倒寂靜了下來；但在珍珠港事變後，原本單純的戰爭格局，加入了舉足輕重的美國因素，中國境內的機場，變成美國空軍進擊日本本土的前進基地，從浙贛會戰起到日本投降為止，日軍在中國境內所發起的戰爭，幾乎都有摧毀美方空軍基地的戰略目的。因此浙江境內衢州等地機場在美方要求下的趕建與破壞，才是挑起日方發動浙贛會戰的最大原因。第二部分是採取傳統戰役史的切入角度，根據浙贛會戰的作戰部署及時序發展，將浙贛會戰分為金蘭戰役、衢州決戰及浙贛路打通作戰等三個階段。這也是現有軍事史著作對於浙贛會戰戰鬥經過的普遍共識，希望透過對於浙贛會戰前後近五個月戰役經過的重新梳理，檢視國軍在此過程中是否出現了戰爭指導方針的策略轉變，以致扭轉了浙贛會戰的走向與結果。最後一個部分則是分析國軍內部，特別是第三戰區對於浙贛會戰的自我檢討。過去關於抗戰史的研究，研究關懷幾乎都集中在蔣中正及其領導中樞，對於身處前線的各戰區，尤其是在第一線的他們，究竟是如何應對每場戰役的部署、肆應與反省等所知甚為有限。這當然與史料的不足有絕對的關係，但在顧祝同的回憶及戰後第三戰區上呈軍令部的報告中，已可稍微彌補此一缺憾。本文嘗試從第三戰區戰役當下的角度，分析第三戰區是如何陳述此役的戰術部署、各部應戰經過、成敗責任及事後的獎賞懲處等，尤其第三戰區自我檢討，也在有意無意間暗示重慶最高當局及地方黨政民政等文職機關，應該要為此役的失敗負起一定的責任。透過這個角度或許也能幫助我們重新理解在抗戰第一、軍民合作的總體戰大目標下，重慶統帥部、前線戰區及基層省縣民政機關三者間的互動關係。

## 貳、浙贛會戰的背景——衢州機場的趕建與破壞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孤軍奮戰四年五個月之久的中國，終於盼到了與美、英同盟作戰的這一刻。戰時一直生活在重慶的胡秋原，即說出大後方民眾在聽聞此一消息後的共同心聲：「美國參戰以後，大家都了解這戰爭必定勝利。」<sup>11</sup>連美方也是如此看待，認為中國從一開始就只想搭美國的便車戰勝日本。早在日本還未發動攻擊前夕，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就以高高在上的姿態，主動向駐美大使胡適提出警告，表示美日戰端一起，雖是人類的一大悲劇，然而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卻是憑空掉下的最大轉機，他希望一旦美日開戰，中國政界領袖及人民能夠自我克制，切勿有公開慶祝之舉。<sup>12</sup>有趣的是，汪精衛政權要員陳公博、周佛海等人的反應也是如出一轍，只是註定最後勝敗的角色對調罷了。<sup>13</sup>

如果說許多中國民眾在聽到美日開戰的消息真的充滿喜悅之情，那也是一個走投無路下弱國人民的合理反應，不過證諸日後的發展，顯然是高興得太早了些。事實上是中國的情況越來越糟，美國對中國這個盟友的實際援助杯水車薪、微乎其微。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美上層軍事合作，已有眾多精闢研

<sup>11</sup> 胡秋原，〈序〉，收入何成濬著，傳記文學雜誌社編輯，《何成濬將軍戰時日記》，上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頁14。

<sup>12</sup>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7冊（臺北：國史館，2010年），頁621。值得注意的是，蔣中正正在聽聞胡適轉達羅斯福警告後的反應，他既不悅且不解，為何像羅斯福這樣的政治家，還是不脫西方人蔑視華人的種族優越感，居然以為中國人對美國被攻擊會幸災樂禍：「此其真不知吾中華民族體仁集義之精神，不知其出此言用意何在。如其為告戒性質，則美、英對華之蔑視心理，羅亦不能越出此錮習以外，可痛。」《蔣中正日記》，1941年12月13日「上星期反省錄」，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sup>13</sup> 12月8日上午汪政權在收到日方開戰的消息後，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會中汪精衛情緒激動，脫口說出日方如此蠻幹，將註定其失敗的命運，而日方竟如此的愚昧與魯莽，完全出乎其意料之外。周佛海與陳公博也承認美日開戰，證明三年前他們對局勢的估計是完全錯誤，「來日大難」已是無可避免的結局。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1冊（臺北：古楓出版社，1986年），頁174；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上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1941年12月8日，頁548。

究。<sup>14</sup> 但對於前線戰場的基層中美軍事合作，目前研究仍頗為不足。由於中國戰場在美國全球戰略部署的邊緣位置，美國在中國及緬甸戰場，始終沒有派出大規模戰鬥部隊，最早開始在中國戰場的軍事合作行動，就是為了空襲日本本土的需要，要求中國興建華東地區機場，包括位於浙江境內的衢州、玉山、麗水等機場，其中又以衢州機場最為重要。而衢州機場的趕建，也埋下了數月後日軍發動浙贛會戰的導火線。

衢州機場始建於1933年，位在衢縣東南郊區一處名為雄雞板的農村地區，國府最初並沒有將衢州機場設定為空軍的主要軍事基地，一開始規畫的機場面積只有約八百平方公尺，時作時輟，直到中日戰爭伊始，興建工程仍未完成。八一三淞滬戰爭的爆發，讓原本僻處一隅的衢州機場頓時變得重要。1937年11月5日，日軍登陸杭州灣金山衛，從側翼包圍淞滬前線已經疲憊不堪再戰的國軍；<sup>15</sup> 另一方面迅即占領浙北的三個重要城市——杭州、嘉興與湖州，同時攻占中國空軍最重要的軍事基地——杭州笕橋機場，笕橋機場的失守對中國空軍是一個致命打擊。<sup>16</sup> 於是衢州機場加緊趕工，1938年3月完成兩道供軍機起降的飛行跑道，衢州機場漸具雛形，取代笕橋成為浙江省的主要空軍基地，然而，這也是它悲劇命運的開始。

1940年2月，日軍渡過錢塘江，占領蕭山，第三戰區誤判日軍將有沿浙贛線

<sup>14</sup> 關於戰時中美軍事合作的最新力作，詳見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

<sup>15</sup> 關於日軍登陸金山衛導致淞滬戰局逆轉的過程，當時擔任淞滬戰場右翼軍總指揮的張發奎，對此有非常坦率的親身觀察。他認為日軍登陸金山衛的確是導致淞滬戰場國軍倉皇潰敗的導火線，但即使日軍不從杭州灣登陸，或者登陸後被國軍擊敗，國軍還是無法守住上海，因為中日兩軍的武器裝備實在太過懸殊，國軍的敗象在10月初就已顯露無遺。淞滬戰役勝負的真正關鍵在於國軍應該提前兩週脫離戰場，從容撤退以保存實力，可惜蔣中正受到宋美齡的影響，強烈主張國軍應不惜一切代價繼續堅守上海前線，等待11月初在布魯塞爾的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必能獲得國際的同情與援助。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頁248-253；王建朗，《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頁91-101。

<sup>16</sup> 劉元孝，〈笕橋初戰紀實〉，《中國之翼》，第3輯（1992年4月），頁4-35。

西進之勢，於是下令破壞衢州機場，以免落入日軍之手。七千多名被緊急徵用的民伕在基地開挖數千公尺的溝壑，破壞機場周遭所有的建築與設施。幾天後，日軍停止前進，衢州空軍基地的破壞行動亦隨之停止，這是衢州機場第一次的趕建與破壞。<sup>17</sup>

1941年5月，紹興、寧波陷落，浙東軍事地位愈趨重要，於是重建衢州機場的聲浪再次響起，但具體付諸行動則是在珍珠港事變後。顧祝同於1941年末接到最高統帥部的指示，儘速修復浙江境內的機場，尤其是衢州機場必須擴建為可容納50架美國重型轟炸機的起飛及降落之用；顧氏遂偕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等人親赴衢州，召開浙省第五區專員及縣長會議，會中顧祝同宣布要在六個月內完成衢州機場擴建工程，違者以貽誤戎機論處。這項擴建工程總共要砍伐直徑20公分巨木360萬株、毛竹90萬根，當地百姓還得將這些木材運到空軍基地，單靠衢州一地勢必無法提供這些原木，必須要從周圍各縣徵集，每縣都分配了定額數量。由於缺乏運輸工具，這些木材多是由被徵勞役者手提肩挑，經過上百公里的陸路運輸方抵目的地。<sup>18</sup>

與會者聽到分派任務時面面相覷，都覺得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連徵集及運輸木材都不夠了，遑論擴建機場。浙省大家長黃紹竑當場忍痛鼓勵眾人說：「我們負地方責任，固然有我們的困難，但軍隊面的困難，比我們還要厲害，長官的命令要怎麼辦，就得絕對服從地去辦，流血犧牲，是軍人最後的責任。我們及人民不過是勞些心、出些力、流些汗。」<sup>19</sup> 汪振國等在地縣長聽到省主席都這樣說了，

<sup>17</sup> 時任浙江省常山縣長的汪振國，對於戰時衢州機場的興建與破壞，有極為詳實的回憶。汪振國，〈衢州飛機場的搶修與破壞〉，全國政協《閩浙贛抗戰》編寫組編，《閩浙贛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頁377-378；黃紹竑，《五十回憶》，中冊（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年），頁474。

<sup>18</sup> 雖然此次會議的確實日期已難查證，但根據顧祝同及黃紹竑回憶等史料比對，應該是在1941年12月底。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年），頁211。另外，即使以今日的標準來看，要求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砍伐360萬株巨木這麼龐大的數量，也是難以想像的，很難相信以當時中國落後的條件可以做到，但由於黃紹竑、汪振國等人的回憶都是相同的記載，在沒有更確切的檔案史料佐證前，仍暫以黃、汪等人的回憶數字為準。

<sup>19</sup> 黃紹竑，《五十回憶》，中冊，頁474。

也就不能不立下軍令狀，全力以赴。事實上，繁重的勞役與血汗的犧牲，自然不會落在動嘴皮的高層身上，而是那些沒有發言權的無辜百姓。適值冰天雪地的寒冬，地方政府下令，所有18-60歲的男性均須徵發伐木，每人至少須運送30公斤木材，基本上都是在沒有交通工具的情況下徒步行走、雙肩背負，每天都有壯丁凍傷、跌落深谷，甚至淹死，國府的戰時要求最終變成了每個人的苦難。

雖然現實條件如此惡劣，不過1942年3月底前擴建機場所需的全部材料幾乎如奇蹟般的準時運抵基地，好不容易到了現場，還得面臨驗收人員的挑剔檢驗，但總算是達成使命。幾乎從一開始，日軍就掌握了衢州機場修建的情報，不斷進行轟炸，被徵集修建機場的民伕達四萬人，政府幾無提供任何食物，壯丁自帶乾糧、自備炊具，抬石頭、平壕塹、擴地基、修跑道，在砲火中日夜趕工，當日機一出現時，工人慌亂逃竄，或躲在溝裡，或藏於樹下，單3月25日一天，50多名工人躲在一個壕溝裡，當場被炸死40餘人。然而，機場擴建工程進度卻十分緩慢，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日機轟炸或是工人怠工，負責監工的汪振國一言道破，問題出在決策者態度反覆不一：「敵人動態不定，有向金、蘭竄擾模樣時，即下令破壞，敵人不來又下令修復，忽破忽修，疲於奔命。」<sup>20</sup>

5月15日，日軍正式發動浙贛會戰攻勢，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當即判斷日軍的目標在摧毀衢州機場。5月27日，曾在1941年末下達六個月內完成衢州空軍基地的顧祝同又下令破壞機場設施，當天兩萬多名工人上午正在搶建尚未完成的基地工廠，填平彈坑，到了下午迅即接到徹底摧毀機場的命令，並限期三日內完成。由於在場工人人數不足，又臨時徵集了包括老弱婦孺在內的數千人加入，經過三天三夜的努力，基地施設及機場跑道遭到嚴重的自毀，這是衢州機場第二次的搶修與破壞。<sup>21</sup>

<sup>20</sup> 汪振國，〈衢州飛機場的搶修與破壞〉，頁378-379。

<sup>21</sup> 衢州機場的多舛命運，亦有論者質疑國軍搖擺於興建與破壞之間的不當決策：「此一焦土政策明顯不合情理，因為日軍本身就是在破壞而不是利用機場，在這種情況下，還徵用勞力協助日軍破壞自己的空軍基地，這其中邏輯何在？」R. Keith Schoppa, *In A Sea of Bitterness: Refuge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67.



國軍則往往是在日軍發起攻勢後才倉促應戰。然而浙贛會戰卻是中日戰爭中極少數的一次例外，至少在日本發起此役的三個月前，蔣中正即已意識到日軍將對浙贛線上擁有機場設備的衢州發起攻擊。換言之，國軍並非毫無防備，然而諷刺的是，國軍統帥部的先知先覺，從會戰的事前準備、戰鬥過程與最後結果來看，顯然助益甚微。

珍珠港事變的一個月後，蔣中正判斷日軍的戰略攻擊目標將是緬甸、海參崴及衢州。<sup>22</sup> 1942年1月17日，蔣電令軍令部長徐永昌，指示由軍令部在3月底前負責督辦並完成衢州在內的十處城防核心工事。<sup>23</sup> 蔣又在2月3日明確指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務必做好防禦準備，他判斷日軍可能會在3月15日前，集中四個師以上的兵力進攻衢州。顧祝同在接到蔣的應戰命令後，於2月6日與浙江省主席黃紹竑親赴衢州檢閱工事，在此停留了三天，顧除召集衢州守軍86軍內部團長以上軍官訓勉應戰方略以鼓舞士氣外，另召集衢州轄境內行政專員、與構築工事有關的各縣縣長及空軍駐衢第13總站等人員，要求對於修建工事所需工料之徵集，務須於3月中前完成，預估工事總費用約需5百餘萬元。<sup>24</sup>

這顯示至遲於2月上旬起，第三戰區就已經緊鑼密鼓地在為即將到來的衢州戰役作準備，蔣中正甚至抱定3月中旬前日軍就會發動攻勢。然而，事實上是直到4月18日，由美軍杜立德（James H. Doolittle）率領的10餘架B-25轟炸機空襲東京等地前，日方都沒有從陸上進攻衢州的任何規畫；但在此一奇襲行動後，日

<sup>22</sup>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8冊（臺北：國史館，2011年），頁97。除了海參崴之外，蔣中正對日軍的戰略企圖可算得上是十分準確，他唯一估計錯誤就是認為日軍將攻擊海參崴，這或許反映了他內心對局勢發展的主觀期待。事實上，在珍珠港事變後，蔣中正最熱切希望的不是英、美能迅速反擊日本，他認為以英、美在遠東的薄弱軍力，根本不足以抵抗日軍，只有蘇聯儘速參戰才能扭轉戰局。因此，12月8日他即緊急致電史達林正式要求蘇聯參戰，同日召見蘇聯大使和蘇聯在華軍事總顧問崔可夫將軍（Vassily I. Chuikov），當面再次強調蘇聯參戰的必要性。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三）（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1年），頁46、57。

<sup>23</sup> 「蔣中正致徐永昌電」（1942年1月17日），〈交擬稿件—民國三十一年一月至民國三十一年二月〉，《蔣檔》，典藏號：002-070200-00013-025。

<sup>24</sup> 「顧祝同致蔣中正電」（1942年2月8日），〈領袖指示補編（十六）〉，《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6-053。

軍立刻意識到浙江境內機場對日本本土安全的潛在威脅，不到一個月即調集10餘萬部隊一舉打通浙贛路全線。從中日兩軍對於時間因素的掌握，即可看出雙方在作戰執行力上的巨大鴻溝。

杜立德空襲行動結束後，東京在第一時間尚無法掌握美機的起降之謎，直到隔天在南昌俘虜一架迫降飛機的美軍飛行員，才確認美方軍機是從航空母艦起飛，原計畫在轟炸後降落衢州機場。東京大本營立即對此作出反應，20日指示「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應迅速摧毀浙江境內的麗水、衢州及玉山等地機場。24日大本營制定「浙江作戰方案」，此役作戰目的在擊潰第三戰區國軍，摧毀浙江境內機場，徹底遏阻美軍利用該基地空襲日本本土，作戰兵力以駐杭州的第13軍為主力，發動時間訂在5月中旬，作戰目標首先攻占金華，繼而占領蘭谿、玉山及麗水等地，最終攻占第三戰區司令部所在地上饒，完成對上述各地的控制後，確保一個月左右的占領時間，徹底破壞機場、軍事設施及主要交通線後，恢復原有對峙態勢。<sup>25</sup>

從4月初起日機即開始密集地轟炸浙東衢州、麗水等地，顧祝同研判這些日機是從上海及杭州起飛，目的是破壞該地的機場設備；<sup>26</sup>自4月20日後連續數日對義烏、麗水、玉山及衢州機場進行大規模轟炸。<sup>27</sup>第三戰區亦察覺到日軍頻繁地調動大軍集結浙北，種種跡象顯示大戰一觸即發，蔣中正在4月24日電令顧祝同速報衢州至金華一帶的工事修築及兵力部署情形。4月25日，第三戰區擬訂「保衛金蘭作戰指導方案」，所設定的作戰目標為如欲確保衢州，須先保衛金華、蘭谿，因此浙贛會戰應在金蘭前線擊敗日軍最為有利，顧祝同所設定的金蘭決戰主要部署為由第十集團軍總司令王敬久統一指揮各部：

<sup>25</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華中方面軍作戰「派遣軍作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頁175-179。

<sup>26</sup> 「顧祝同電蔣中正日機轟炸麗水衢州等機場」(1942年4月2日)，〈八年血債(五十)〉，《蔣檔》，典藏號：002-090200-00074-254。

<sup>27</sup> 「顧祝同電蔣中正20日日機由杭州分批自諸暨侵襲義烏麗水並造成災情」(1942年4月22日)，〈八年血債(五十)〉，《蔣檔》，典藏號：002-090200-00074-243；「顧祝同電蔣中正21日日機分批侵襲衢州麗水機場」(1942年4月23日)，〈八年血債(五十)〉，《蔣檔》，典藏號：002-090200-00074-245。

(一) 負責防守金華、蘭谿及衢州主陣地的守城部隊：

- (1) 86軍16師曹振鐸部及67師陳頤鼎部守備衢州。
- (2) 86軍79師段霖茂部守備金華。
- (3) 100軍63師趙錫田部守備蘭谿。

(二) 駐守金華、蘭谿及衢州外圍區域之決戰部隊：

- (1) 暫9軍馮聖法部守備新昌、嵊縣。
- (2) 88軍何紹周部守備陳蔡市、安華、諸暨。
- (3) 49軍王鐵漢部守備義烏、孝順、東陽。
- (4) 26軍丁治磐部到達後駐守龍游、湯溪、武義。
- (5) 74軍王耀武部到達後駐守金谿、弋陽、玉山。

根據第三戰區的最初規畫，駐守國軍在金華前緣陣地逐次抵抗後，誘敵至金華、蘭谿陣地，切斷日軍後路，以前述的五支決戰主力部隊在金華東北及西北面合圍殲滅日軍。從這個方案中可以看出，第三戰區的作戰構想是根本不讓日軍有進占衢州機場的機會，而是以前線的金華為誘餌，吸引日軍到此地後，隱藏在外圍區域的援軍迅速趕至，內外夾擊日軍。<sup>28</sup> 此方案在5月6日獲得軍事委員會核備採行。<sup>29</sup>

到了5月3日，顧祝同小幅度調整作戰部署，將74軍及26軍原先設定的防地對調，74軍改為駐防武義、湯溪、龍游，26軍改調至江山、玉山、弋陽、橫峯。<sup>30</sup>

<sup>28</sup> 「顧祝同電蔣中正呈復衢州金華工事程度及兵力部署」（1942年4月25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一年〉，《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297-031；「顧祝同電蔣中正金華衢州等地兵力部署」（1942年4月26日），〈領袖指示補編（十六）〉，《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6-054；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浙贛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66年），頁9-14。

<sup>29</sup>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浙贛會戰》，頁9。

<sup>30</sup>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二）（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1年），頁553-554。

26軍及74軍是參加浙贛會戰的國軍中，唯一不是隸屬於第三戰區戰鬥序列下的部隊，而是從薛岳的第九戰區臨時調來支援浙贛會戰的生力軍，相較於數年未經戰事、承平已久，連戰區高層都自承戰力低落的第三戰區部隊，剛經歷過第二次及第三次長沙會戰洗禮的74軍及26軍，是國軍內部少數具有戰略意義、並能執行攻堅任務的野戰部隊。<sup>31</sup>

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的第三次長沙會戰結束後，74軍的駐地為湖南衡山，26軍則駐紮在湖南平江。王耀武及丁治磐在4月9日接到蔣中正命其支援浙贛會戰的作戰電令，26軍於4月12日自平江率先開拔，最初重慶統帥部所下達的指示是限丁治磐部於5月底到達衢州，中途幾度修改目的地，最終丁部的軍部及下轄三個師在5月14日分抵江西與浙江交界的玉山、江山、橫峯及弋陽，從平江到玉山兩地間的直線距離約4百公里。由於日軍掌握制空權，戰時國軍移防都儘量避免白天行軍，免得成為日機轟炸的目標，丁治磐在日記裡詳細紀錄了這一個月來的移動過程，由於缺乏交通運輸工具，除極少數高階軍官有車可坐外，部隊基本上都是徒步行軍，每日行軍多則約70公里，少則約40公里。<sup>32</sup> 王耀武部則是於4月14日自衡山出發，74軍雖是國軍機械化程度較高之部隊，但其行軍速度並沒有比丁部來得快，直至5月中旬還未趕至浙江前線。<sup>33</sup>

<sup>31</sup> 第三戰區部隊的作戰能力不佳，蔣中正在抗戰八年中曾多次嚴厲斥責，但似乎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早在武漢會戰結束後的半年，蔣就指稱在各戰區的表現中「第三戰區成績最差」。在每一年度各戰區的評比中，第三戰區幾乎都是敬陪末座。「蔣中正電顧祝同訓斥第三戰區成績最劣」（1939年4月25日），〈領袖指示補編（十四）〉，《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4-056；「蔣中正電斥蔣鼎文及顧祝同1942年度第一及第三戰區戰績最劣」（1943年1月5日），〈交擬稿件—民國三十二年一月至民國三十二年三月〉，《蔣檔》，典藏號：002-070200-00017-001。包括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也自承該戰區部隊多為川軍等地方軍系，作戰力十分薄弱。當丁治磐部趕到玉山時，該戰區副司令長官上官雲相是丁的老朋友，曾當面提醒國軍在浙贛線上的防務極為空虛，不堪一擊，要丁部多加小心。劉鳳翰、張力訪問，毛金陵紀錄，《丁治磐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頁75。另關於74軍及26軍在抗戰中的作戰表現，參見張明金、劉立勤，《國民黨歷史上的158個軍》（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頁319-321；曹劍浪，《國民黨軍簡史》，上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頁643。

<sup>32</sup> 丁治磐在日記裡記下每天的行軍里程、停留過程、宿營地點、日機空襲傷亡情況，甚至連每日的後勤補給及所需糧食等，都有鉅細靡遺的記錄。丁治磐，《丁治磐日記》，第3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1942年4月12日，頁165-166。

<sup>33</sup> 丁治磐，《丁治磐日記》，第3冊，1942年4月15日，頁171。

日軍在浙贛會戰中的主攻部隊為第13軍，在5月上旬日軍主力已完成集結在杭州、紹興至餘姚一線，所設定的進攻路線沿浙贛鐵路一路前進，攻占浙贛線上的重要城市金華、蘭谿、衢州及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上饒，最終與自南昌出發的第11軍在浙贛線西段的橫峯、弋陽會師，打通並控制浙贛鐵路全線。

日軍的第一波攻勢在5月14日深夜至5月15日清晨展開，首先攻擊的目標並非浙贛線上的城鎮，而是聲東擊西自奉化奇襲大堰市直至新昌一線，守軍暫9軍馮聖法部不戰而退；5月17日至18日日軍主力沿浙贛線前進，迅速攻占位於金華前緣的長樂、安華街及義烏等要地，此時金華距義烏日軍陣地前緣已不足60公里，戰況已是急如星火、迫在眉睫。<sup>34</sup>

根據日軍大本營原先的判斷，由於在武漢會戰後長江水路交通完全落入日方的掌握之下，金華即成為國府自華東沿海港口走私各種物資的最重要轉運站，僅1941年下半年就運輸了至少6,500噸的物資，認為國軍無法承受放棄金華的政治與經濟代價，因此日軍預料國軍勢必堅守金華，在金華周遭陣地將會遭逢頑強的抵抗。<sup>35</sup>

然而，事實卻大出日軍之意料，如果說蔣中正早在1月時就已提醒顧祝同與第三戰區務必做好防禦日軍進攻準備，顯然這個訊息並未傳達給其他人，或至少

<sup>34</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華中方面軍作戰「派遣軍作戰」(一)》，頁212-223。

<sup>35</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華中方面軍作戰「派遣軍作戰」(一)》，頁202-203。關於戰時金華商業貿易的繁盛景象，戰地記者出身、同時也是金華人的曹聚仁曾有生動的描述，當他在武漢會戰結束返回金華時，金華的繁華簡直讓他不敢相信：「僅僅三個月的小別，我幾乎不認識我的家鄉。有史以來，這是第一回，金華的市面若配上一個西湖，就變成了十足的杭州城，街頭偶步，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全是蘇小鄉親，樓外樓、天香樓、西泠飯店等，仿佛汴宋當年！」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曹聚仁回憶錄》，下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頁675。戰時長期擔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廳長的阮毅成，也從省府高層的角度，指出杭州失陷後，金華就成為浙省境內最重要的經濟與軍事中心，對於缺乏各種物質的大後方來說，金華更是搶運、輸入與走私物資的第一道門戶：「金華處浙贛鐵路中心，為前後方來往孔道。贛、湘、桂、川需用舶來品物，尤其是醫藥器材，仍可由上海淪陷區，通過封鎖線至金華，再換鐵路後運。其時金華不但為浙省軍事機關所在地，且亦為走單幫者之集散點。因以人口增加，市面繁榮，不類前方戰地。」阮毅成，《八十憶述》，下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1年），頁579。

絲毫未引起浙江軍政官員的警覺心，這也反映了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與地方機關間在情報訊息聯繫上的隔閡。因為日軍出兵當日的5月15日，正是浙江省政府籌劃多時、耗費數百萬元，預定在金華召開的全省工商展覽會的日期。開幕當天盛況空前，第三戰區方面大員及重要將領到者甚多，席間完全未有人談及日軍即將進犯，完全一派歌舞昇平景象，直到當晚日軍進攻消息傳來，金華軍政當局瞬間全慌了手腳、上下亂成一片。從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及民政廳長阮毅成這兩位最高民政首長的回憶裡，即可一窺當時浙江省內的混亂局面，軍、政、黨、民四方是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誰也管不了誰，大難來時，只應了一句古話：自求多福。

據黃紹竑的說法，他直到5月17日晨始收到軍方的通知，第三戰區臨時改變預定在金華決戰的計畫，這無疑是要放棄金華，要求儘快疏散金華軍民，黃在20日下午逃離金華撤往縉雲。當他在離開金華時，看到尚有眾多百姓仍待疏散而徬徨躊躇，想到一個四年來因戰爭而繁華無匹的金華，就此遭戰火葬送時，真是感到無比痛心。<sup>36</sup>

然而在阮毅成的回憶，說的卻是黃是一個率先出走、未盡職責的父母官。他自承浙省當局在浙贛會戰的一敗塗地，完全是咎由自取，因為在5月15日前的一個半月裡，黃紹竑與阮毅成都在浙東溫州、臺州兩屬各縣視察，由於各地公路幾已破壞，皆需翻山越嶺、仰賴步行，阮毅成在出發時曾詢問黃，彼我係負民政最高責任之人，長時間離開省府中樞，萬一日軍進犯，應變無人，是否應重新思考此行之必要，但黃卻信心滿滿謂彼係軍人出身，向來洞悉軍情，現並未有日軍蠢動情報，絕對可以放心。當黃風塵僕僕地於15日趕回金華主持工商展覽會開幕式時，阮毅成還遠在麗水視察，直到17日方抵金華。當阮一到金華時，就接到黃的命令，指派他全權負責金華軍民的撤退任務，至於撤往何處，則由各機關隨機應變、自行決定。此時金華對外公路已開始全面破壞，由阮毅成負責撤退的民政廳局處人員及學生眷屬超過1千人，運輸工具僅有一輛老舊的大卡車及兩輛小轎車，當阮一行人撤退至永康時，正巧遇見黃紹竑也在此處，直到此時黃仍對阮表示軍方決定堅守金華、蘭谿一線，讓他在永康收撫難民及應變一切，黃在指示後

<sup>36</sup> 黃紹竑，《五十回憶》，中冊，頁447。

即續奔赴緝雲。黃一路南撤，最終落腳於浙江與福建交界的龍泉縣，已是浙南退無可退的最邊境，百般寂寥下，終日賦詩填詞以為排遣。<sup>37</sup>

此後半個多月，阮毅成毫無黃紹竑的任何音訊。<sup>38</sup> 這裡最難以理解的是，既然國軍高層早已預料日軍會進攻衢州，為什麼還會在這時舉辦冠蓋雲集、耗費巨資的全省工商展覽會？根據黃紹竑的親身觀察，在淞滬會戰後的近四年中，由於浙東長期未歷戰火，漫長的戰時已變成了平時，浙江省府從上到下皆存著一種苟安僥倖的心理，在心態上都賭日軍不會進攻；戰時臨時省會之所以選擇永康，也反映了普遍瀰漫在百姓心中的迷信與愚昧，當時各省的臨時省會如福建的永安、江西的泰和、湖北的恩施就像浙江的永康一樣，雀屏中選的一大原因，都是取其名稱吉利的好兆頭，浙江省府機關則設在永康附近的方岩，也是因鄉里傳說這是一塊風水寶地，當地百姓認為：「省政府在方岩四年多的時間裡，敵機未曾來轟炸過，因為這裡的風水好，還有胡公大帝的神力來保護，當敵機飛臨方岩上空的時候，胡公大帝就大顯威靈，騰雲駕霧來遮蔽敵人的視線，使它不能投彈。」<sup>39</sup>

這種苟安僥倖的心理同樣也充斥在軍方內部，丁治磐即觀察到在抗戰中由於渴望勝利的普遍心理，軍中從上到下都出現了一種一廂情願的主觀思維，對於來自日軍的情報與進軍，都主觀地從日軍在取得戰果後就會自動退卻的角度來思考。<sup>40</sup> 如果說苟安僥倖的心態，消極地導致浙江省府當局毫無應對戰事的防範，更重要的勝敗關鍵在於原先策畫好的主動拒敵於前線之外的金華決戰方案，為

<sup>37</sup> 黃紹竑，《五十回憶》，中冊，頁438-439。

<sup>38</sup> 阮毅成對於黃紹竑等軍人出身者在浙贛會戰中的怯懦表現，譏諷道：「可見武人膽識，有時且較文人為小。」阮並記下在黃所填的數十首詩詞中，堪稱佳作的「臨江仙」一闕：「半壁殘餘今已矣，五年枉費心腸。宏圖宿願未能償，個中疑有數，成敗費思量。勳業自來多鬼妒，幾番遭遇創傷。湖山黯淡減容光，實慚勾踐地，無語話悽愴。」當阮毅成率部撤退至永康時，由於黃紹竑並未明言軍方已放棄金華決戰，當時設在永康的浙江省各銀行經理金潤泉、張忍甫等還相信黃的說法，認為國軍將堅守金蘭，判斷事態尚不致嚴重，阮則認為這純係黃安慰人心之空言，絕不可輕信。由於在抗戰的撤退中，被視為第一要務的就是銀行的撤退，如果銀行的儲備款項落入日軍之手，不但經濟上會受到極大打擊，地方當局也會受到中央嚴厲懲處。阮毅成遂率永康地區的銀行、相關軍公教人員及眷屬，一路撤退至武義，最終在宣平落腳，直至浙贛會戰結束。阮毅成，《八十憶述》，下冊，頁583。

<sup>39</sup> 黃紹竑，《五十回憶》，中冊，頁438。

<sup>40</sup> 丁治磐，《丁治磐日記》，第4冊，1944年7月27日，頁185。

何臨陣改弦更張？這無疑是兵家大忌。第三戰區原依計畫在金、蘭地區與日軍決戰，但在日軍發動全面攻勢後，顧祝同在16日曾兩度致電蔣中正，希望能將王耀武及丁治磐兩軍儘快調至金蘭前線，與守軍裡應外合、聚殲日軍。<sup>41</sup>但當日他即接到蔣的電令：「將王耀武、丁治磐、王鐵漢三個軍，集結於衢縣附近，切勿停留於金華、蘭谿一帶，被日軍逐次消耗，我軍方針決在衢州決戰，不得變更。」<sup>42</sup>於是顧緊急重新部署「保衛衢州會戰指導腹案」，只留下原先規劃的守城部隊79師及63師固守金華、蘭谿，並指示如果日軍攻勢猛烈，即主動放棄金蘭，退入周圍山區潛伏，伺機截斷日軍補給，戰略目標完全轉移至接下來的衢州決戰。<sup>43</sup>

自23日起，日軍開始猛烈攻擊金華，全城陷入一片火海，由於缺乏援軍，79師段霖茂部在堅守抵抗五天後於28日退出金華，同日蘭谿守軍63師在接到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的命令後亦主動撤出，日軍在29日宣布完全占領金華、蘭谿，結束了浙贛會戰第一階段的金蘭戰役。<sup>44</sup>日軍在進入金華後，日軍第13軍司令官澤田茂對於金華的防禦工事極為贊許：「金華城外陣地，其南北延長約有八公里，乃是以正式工法所構築之工事，在要點上配以大規模的混凝土碉堡，並有鐵絲網、鹿砦、戰車壕等障礙物，十分地堅固。可看出敵人之防禦工事乃相當新式而考究。」<sup>45</sup>不過籌畫經年的金華城防工事，顯然對於阻擋日軍的攻勢收效甚微。

<sup>41</sup>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二），頁560。

<sup>42</sup> 「蔣中正電顧祝同指示改於衢州決戰」（1942年5月16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4-013。軍令部長徐永昌也說在5月16日的官邸會議中，即決定以26軍、74軍、49軍、86軍集衢州以集中打擊日軍。徐永昌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6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942年5月16日，頁401。

<sup>43</sup> 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頁215。

<sup>44</sup> 安守仁，〈浙贛會戰中的金華蘭谿戰鬥〉、韓正禮，〈激戰蘭谿擊斃酒井師團長〉，全國政協《閩浙贛抗戰》編寫組編，《閩浙贛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頁340-341、352。

<sup>45</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華中方面軍作戰「派遣軍作戰」（一）》，頁245、248。阮毅成也說金華工事經國軍數年苦心經營、耗費人物、物力極多，當地守軍也十分自信，認為憑藉既有工事必能固守金華。阮毅成，《八十自述》，下冊，頁585。

回顧5月15日至29日的金蘭戰役，國軍在個別地區，如預5師曾戛初部在建德、79師在金華、63師在蘭谿都曾有個別部隊堅守陣地，造成日軍一定的傷亡。但由於國軍採取分散式的防守策略，大部分是以團為單位，散布在各地駐守，國軍分散駐防的部署在優勢日軍進攻下，立刻呈現嚴重問題，不但備多力分，且來不及集中有力部隊進行反擊，於是部分守軍不是在據點內全軍覆沒，就是化成小股散兵望風而逃，更糟糕的是彼此爭先恐後，毫無秩序，指揮官完全無法掌握第一線部隊動態。<sup>46</sup>

最值得檢討之處，在於蔣中正及軍令部既然在5月初核定第三戰區提出的金蘭決戰方案，卻在日軍發動攻勢的第二天，將決戰地點改為衢州，這無疑增添了前線調兵遣將的混亂。<sup>47</sup> 蔣中正從珍珠港事變後就一直認定日軍的目標將會是擁有良好機場條件的衢州，蔣的戰略構想是冀圖誘敵深入，在衢州圍殲日軍。這個規畫並沒有太大問題，但最高統帥部的失策在於既未能於第一時間否決第三戰區的金蘭決戰方案，又在戰端開啟後遽爾修改，戰場狀況瞬息萬變，尤其浙江前線的鐵、公路交通泰半中斷，國軍移動幾仰賴於步行，面對機動性強大的日軍，蔣顯然沒有考慮到他的軍隊是否能配合其一日數變的指令。<sup>48</sup>

雖然第三戰區沒有實現金華會戰計畫，但此時浙贛會戰局勢仍在掌控之中，日軍也承認由於國軍迅速撤離陣地，儘管攻下金華、蘭谿、建德等重鎮，但並未

<sup>46</sup> 吳幼元，〈建德三晝夜激戰〉，全國政協《閩浙贛抗戰》編寫組編，《閩浙贛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頁342-344。

<sup>47</sup> 「蔣中正電願祝同務將王耀武等三軍集結於衢州切勿置於金蘭被敵消耗」（1942年5月16日），〈領袖指示補編（十六）〉，《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6-154。

<sup>48</sup> 國軍將領於達對此曾有生動的描述，並認為這是戰時國軍指揮體系上的一大弊病：「打仗是瞬息萬變的事，前面一個情況，一直到師長曉得，起碼已經過了十二個小時，最快、最近的也要兩小時才曉得。無線電的操作有一定時間的。師長得到一個情況後，再由參謀長作報告，也要一天。擬電報、譯電報，再去拍，拍到侍從室，再譯給蔣委員長看，已經過了幾天了。加上又逢委員長休息、開會啦，等到他下命令，情況早變了。不是他的命令錯，而是情況不同了，照他的指令做，必定打敗仗，這是必然的。我們指揮系統的大毛病就在此。軍隊無法獨立作戰，力量受到本身的束縛無法發揮，這是革命軍積習很深的習慣，也是一個大病。」張朋園、林泉、張俊宏訪問，張俊宏紀錄，《於達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頁121-122。

捕捉到國軍主力。<sup>49</sup> 如果真的依照蔣中正的指示，誘敵深入，將日軍主力吸引到衢州，內外合力聚殲日軍，也同樣可以達到作戰目的。接下來浙贛會戰重中之重的勝敗關鍵，一切就看國軍在衢州決戰中的表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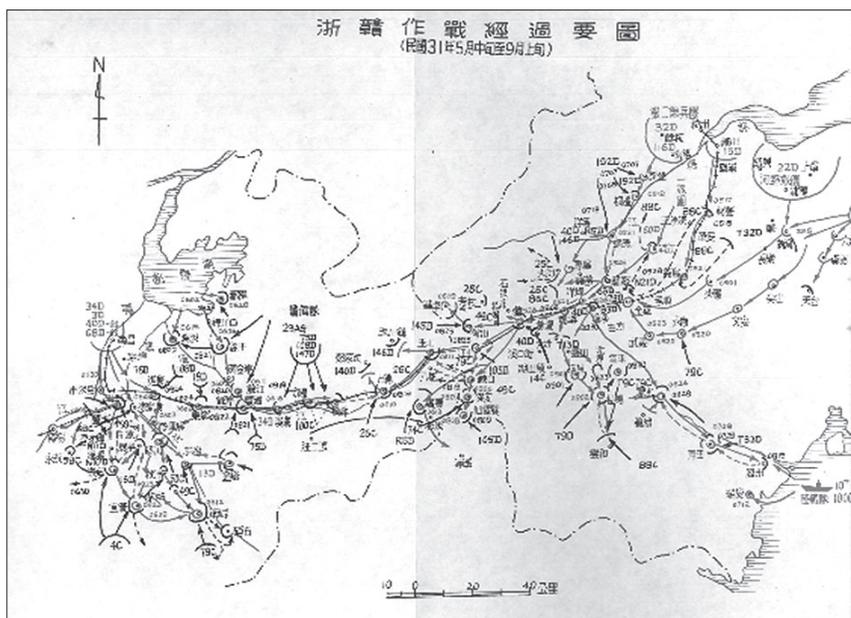


圖2、浙贛會戰中日兩軍交戰經過圖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後期戰役》，第4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5年），頁284。

## 肆、朝令夕改——衢州決戰的轉折

從金蘭戰役到衢州決戰，最大的差別在於第三戰區從原先擁有制定作戰計畫權限的主導角色，逐漸變成一個完全聽命於重慶統帥部指示的下級單位。從雙方

<sup>49</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華中方面軍作戰「派遣軍作戰」（一）》，頁249-251。

來往的作戰電令中，我們幾乎看不到第三戰區對於重慶統帥部的指示，提出任何的質疑或補充意見，更遑論反對的聲音了；這當然與蔣中正高度且密集介入衢州決戰的指揮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探討衢州決戰的過程，除了第三戰區轉趨被動的角色外，無可避免地亦要一併討論重慶統帥部在衢州戰役的決定、部署與最後的轉折，因為它已經變成了套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頭上的一個緊箍圈了。

首先，重慶統帥部是在5月16日收到日軍向浙東進攻的消息，此時蔣中正對於浙贛會戰的態度頗為樂觀，他判斷參與此役的日軍是從華中各戰場調集而來，並沒有抽調東北的關東軍，以第三戰區的兵力應該足以應戰。蔣認為日軍行動：「已如預期者開始，準備已久，不難制敵乎！」<sup>50</sup>但顯然蔣的情報來源大有問題，日軍已從華北方面調來戰力精良的第30師團及小蘭江混成旅團共15個步兵大隊，增援前線的第13軍，共計參戰總兵力約12萬人。<sup>51</sup>

從浙贛會戰開戰的第一天起，蔣即鉅細靡遺地頻繁指示顧祝同及前線將領，每日少則3、4通電報，最多的一日為5月17日，共發出多達12通電報給顧祝同。關於蔣中正的集權指揮風格，已有學者對此詳加闡釋，在此不予贅述。<sup>52</sup>雖然蔣中正的作戰指示，近乎雞毛蒜皮、毛舉細故，幾乎是把自己當成顧祝同的參謀官。<sup>53</sup>不過從蔣瑣碎的指示中，仍可分梳出三項應戰重點：首先在兵力部署方

<sup>50</sup> 《蔣中正日記》，1942年5月16日「上星期反省錄」。

<sup>51</sup> 日軍參與浙贛會戰的3支派出部隊分別為：（一）擔任浙江方面的主攻部隊第13軍，下轄參戰兵團計第15師團、第22師團、第70師團、第116師團及原田混成旅團；（二）擔任自江西方面夾擊任務的第11軍，下轄河野混成旅團；（三）從華北方面軍抽調支援的第30師團及小蘭江混成旅團。合計共8個參戰師（旅）團、56個步兵大隊。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華中方面軍作戰「派遣軍作戰」（一）」，頁187。

<sup>52</sup> 對於蔣中正集權指導的精闢分析，參見張瑞德，〈遂制——蔣介石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2005年7月），頁37。曾任侍從室參謀的徐復觀也曾在蔣中正面前，將國共兩軍的指揮方式作了一針見血的比較：「有不少人認為總裁直接指揮作戰的方式不太妥當，……匪軍特性之一，是他們的機動能力特別強。由前線的團長、師長，把情況逐級報到總裁這裡來，再由總裁指示下去，中間經過的時間，匪情已經有了變化，再適當的指示，也成為不適當的了。尤其是養成他們遇事請示的倚賴習慣，缺乏積極地責任心，失敗後，把責任都向總裁身上推，這種風氣應矯正過來。」徐復觀，〈垃圾箱外〉，《徐復觀雜文—憶往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頁39。

<sup>53</sup> 抗戰期間蔣中正曾多次有這樣的感慨，覺得自己簡直變成前線將領的參謀官，但他雖然意識到此一問題，卻始終故態復萌、一犯再犯。例如在1944年的豫湘桂會戰中，也曾表示：

面，5月16日至29日，日軍的攻擊目標為金華及蘭谿，但蔣從戰役一開始就只關心衢州工事及布防，要求顧祝同將砲兵陣地集中在衢州防務使用；<sup>54</sup> 並且一再詢問王耀武74軍、丁治磐26軍及王鐵漢49軍的動向。如前所述，74軍及26軍是因應浙贛會戰從第九戰區調來支援的國軍精銳部隊，49軍則是前一（1941）年才從第九戰區調來增援第三戰區的部隊，這3個軍是浙贛會戰中蔣中正最看重的部隊，也是負責聚殲進攻衢州日軍的主力軍。

蔣中正在16日指示顧祝同將王耀武及丁治磐軍集結在衢州附近，17日，指示顧祝同將原駐防在金華前緣陣地義烏、孝順之王鐵漢軍，速往衢州移動，改調他部換防，王耀武及丁治磐軍則應駐守在弋陽、玉山一帶。由於弋陽、玉山均在衢州的後方，蔣顯然是希望將這3個軍留到衢州決戰的最後關頭再用，因此再三叮囑，勿使王丁兩軍過早暴露，避免被日軍偵知。<sup>55</sup> 同日，蔣再電顧祝同，明確將浙贛會戰計畫修正為：（一）改在衢縣與日軍進行主決戰；（二）衢縣、金華、蘭谿由86軍及63師分別防守，尤其應加強巷戰工事；（三）王耀武74軍、丁治磐26軍及王鐵漢49軍為此役總預備隊，應配置於衢縣兩側山區，不得分散使用或過早參加戰鬥；（四）其餘各部擔任遲滯消耗日軍任務；（五）對日軍後方尤其富春江及浙贛鐵路，須指定部隊確實截斷日軍連絡補給線。<sup>56</sup> 17日夜晚，蔣中正仍不放心，再次致電顧祝同，反覆指示衢州決戰所要注意的事項：「務希將第四十九、第二十六、第七十四軍之三個軍，皆調集於衢州附近，以備決戰。總須敵軍到衢州兵力有三個師團以上之預計，故我軍非有精強之三個出擊軍，不足以應戰。」<sup>57</sup>

---

「河南戰事緊迫，將領無能，自作戰方鍼至局部處置，皆非親自留心與處置不可，余幾乎身任蔣鼎文之參謀官矣，可悲可憐，然而戰局卒能轉危為安矣！」《蔣中正日記》，1944年5月6日「上星期反省錄」。

<sup>54</sup> 「蔣中正電顧祝同詢衢州工事及砲兵陣地選擇與集中使用應特別注意」（1942年5月16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4-011。

<sup>55</sup> 「蔣中正電顧祝同將王鐵漢軍置義烏孝順太不經濟其中兩師速向衢縣移動」（1942年5月17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4-019。

<sup>56</sup> 「蔣中正電顧祝同指示衢州決戰方略」（1942年5月17日），〈領袖指示補編（十六）〉，《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6-153。

<sup>57</sup>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9冊（臺北：國史館，2012年），頁376-377。

從金華沿浙贛線向衢州進軍的路途上，龍游是必經之地，也是衢州城外的最後一道防線，蔣中正在5月25日指示顧祝同，74軍必須在龍游至遂昌以西山區之靈山、大洲鎮及洋口市之間隱蔽駐紮。<sup>58</sup> 當日下午他進一步補充74軍應配置的隱蔽地點：「默察敵軍進攻金華計畫，不由義烏直進，而經永康轉武義、繞攻金華，是其嚴防我軍主力，在金華兩側外翼，以試探我兵力之部署方式，其將來進攻衢州，亦必注重我兩側外翼之配備無疑。故王耀武軍不可置在靈山大洲一帶，如被敵軍先偵識我主力隱蔽之所在地，則此次殲敵計畫不能生效，故七十四軍應控置於靈山大洲以南地區，須離靈山大洲一日行程，或在衢州之直南方，必須敵軍攻衢不下，相持二三日之後，我總預備隊再發現出擊，乃能生效。」<sup>59</sup>

同一時間，蔣也一再電囑王耀武務必隱蔽行蹤及秘密行軍，並駐紮於深山之中，為封鎖消息外傳，禁止當地人民通行，再三提醒必待日軍進攻衢州數日後，絕不得過早出擊，以免暴露為要。<sup>60</sup>

其次，在蔣中正的作戰命令裡，反映了國軍在中日戰爭中一直揮之不去的應戰思維——焦土作戰的策略。從戰爭爆發伊始，在各方面都居於劣勢的國軍，為了以空間換取時間，普遍採取破壞鐵公路及各種公共設施的極端做法，藉以阻擋日軍的攻勢，其中以1938年6月的黃河花園口決堤及10月的長沙大火事件最為慘烈，雖然的確達到了延遲日軍進軍的目的，但也讓無辜百姓付出了龐大的生命財產代價。鑒於長沙大火事件對於抗戰的民心士氣打擊甚大，事件結束後，國軍內部呼籲焦土作戰的聲浪，始逐漸沉寂下來。<sup>61</sup>

雖然焦土作戰這四個字不再廣泛出現在官方文書與作戰指示中，但它始終是

<sup>58</sup> 「蔣中正電顧祝同指示王耀武軍必須在龍游至遂昌以西山區之靈山、大洲鎮及洋口市之間隱蔽駐紮」（1942年5月25日），〈籌筆—抗戰時期（四十八）〉，《蔣檔》，典藏號：002-010300-00048-055。

<sup>59</sup> 「蔣中正電顧祝同79軍應控置於靈山大洲以南地區須離靈山大洲一日行程」（1942年5月25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4-035。

<sup>60</sup> 「蔣中正電顧祝同轉王耀武務必隱蔽秘密行軍並駐紮於深山之中」（1942年5月25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4-038。

<sup>61</sup> 關於國軍焦土作戰策略的研究，參見楊維真，〈長沙大火事件的調查與檢討〉，收入吳淑鳳等編，《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臺北：國史館，2012年），頁65。

支配國軍面對日軍進攻的重要策略，由於雙方在戰力上的巨大差距，國軍很早就意識到它極難在戰場上擊退日軍，必須要仰賴破壞交通線等焦土作戰方式，延遲日軍機械化部隊的進軍速度，甚至徹底破壞一切可用設施及焚毀糧食物資，讓日軍失去攻占領土的目的。例如直到1941年9-10月第六戰區為配合第二次長沙會戰所進行的宜昌爭奪戰中，蔣中正仍一再指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如果不能奪回宜昌，就將其化為一片焦土，使日軍無占領之必要。<sup>62</sup>

浙贛會戰一開始，蔣中正即指示顧祝同將浙江境內的數條重要公路包括淳安經遂安、開化至常山，壽昌至龍游，及衢州周圍所有的聯外道路在一星期內徹底破壞。<sup>63</sup> 5月16日，蔣再電顧氏為防日軍從南昌進軍夾擊衢州，嚴令徹底破壞浙贛鐵路西段進賢至鷹潭沿線的道路橋樑。<sup>64</sup> 蔣還另電黃紹竑於十日內盡毀永康通往縉雲及麗水的公路。此後數日蔣中正均曾一再叮囑務必將浙江境內鐵公路悉數破壞，並於沿途廣設伏兵襲擊日軍。<sup>65</sup> 黃紹竑自述受命破壞縉雲至麗水公路的艱辛，由於手無一兵一卒，他最後是在前線撤退部隊的協助下，派出一營工兵，總計用了3千多公斤的黃色炸藥，才將這條號稱浙東天險，橫亘於括蒼山脈上危巖險壁的崎嶇山路炸毀。在浙贛會戰期間，至少有6萬2千名平民被徵調勞役破壞鐵軌、公路，甚至是山林小道。<sup>66</sup>

第三、在蔣中正的作戰指示中，雖未出現游擊作戰的字眼，但從他一再要求

<sup>62</sup>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臺北：國史館，2004年），頁175。

<sup>63</sup> 「蔣中正電顧祝同指示對衢州周圍各大小道路應徹底破壞並設伏布置」（1942年5月16日），〈領袖指示補編（十六）〉，《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6-158。

<sup>64</sup> 「蔣中正電顧祝同指示對進賢至鷹潭周圍各大小道路應徹底破壞並設伏布置」（1942年5月16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4-016。

<sup>65</sup> 「蔣中正電顧祝同黃紹竑指示對永康麗水周圍各大小道路應徹底破壞並設伏布置」（1942年5月17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4-018。

<sup>66</sup> 黃紹竑，《五十回憶》，中冊，頁448。國軍的焦土政策，是否真的有達到遲滯日軍進軍或使日軍放棄進攻，效果令人存疑，但至少此一「自己和自己過不去」的策略，對於自己軍民百姓的撤退過程，造成了巨大的困擾。阮毅成就說當他5月17日返抵金華時，立即接到撤退指示，而且省政府各機關人員必須在當日下午4時前全部撤離，因為從4時起即破壞沿線所有公路，屆時不但無路可走，且所有車輛也都無法後移。阮毅成，《八十憶往》，下冊，頁581。

主力部隊王耀武等部務必隱蔽行蹤，駐紮於深山之中，不到最後關頭，切勿輕易出擊；並指示顧祝同各部最多只留下一半兵力據守陣地工事，其餘兵力均用於沿途多設伏兵、多埋地雷等，無疑帶有一定的游擊作戰思維。<sup>67</sup> 從蔣於開戰日起的多項指示裡，只將鐵公路沿線各城鎮據點工事的正面防禦工作，視為遲滯日軍進展的次要任務，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在日軍進軍途中的兩側山區廣設伏兵奇襲：「阻止其後續部隊，務使其增援前進部隊，使之前後脫節，除核心工事以外，應在各路途廣設伏兵，一進至金華、蘭谿至衢州之間，使之到處受我襲擊；尤應預想其沿途及其各指揮部所地與衢州附近敵之高級司令部所在地，以便夜襲，此最為重要。」<sup>68</sup>

5月19日，蔣更進一步指示：「我軍在信安江兩岸山地，及由諸暨至衢州鐵路兩側山地，務須集多數兵力分為六個地區，每一地區之正面約五十華里，須各備山炮〔砲〕一至二門，專為阻滯其後續部隊之前進，節節予以截擊，但不必與之決戰，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東我西、敵西我東，使之無法向其目的地集中。」<sup>69</sup> 這幾乎已經與毛澤東在抗戰前夕總結贛南時期紅軍游擊戰爭最高原則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無甚分別。<sup>70</sup> 最後，蔣也不忘一再叮囑顧祝同對於王耀武、丁治磐及王鐵漢等三個主力軍：「使用兵力，切勿太早，必待敵軍攻勢頓挫疲極時，再加出擊為妥。」<sup>71</sup>

為了因應蔣中正的衢州決戰指令，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緊急在5月18日調整

<sup>67</sup> 關於多設伏兵、多用奇兵等，原本即常見諸中國歷代戰爭及兵書記載，與現代作戰中所指的游擊作戰，有著相當的差異，在此非常感謝本刊匿名審查人的提醒與指正。不過，究竟什麼是游擊戰，國共兩軍將領對於游擊戰的認識，其實存在著極大的差距。事實上，國軍一直都將游擊戰視為正規作戰的一部分，從來都沒有發展出類似共軍在游擊戰中的主體性思維。

<sup>68</sup> 「蔣中正電顧祝同指示衢州決戰如何據守及遲滯日軍」（1942年5月16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4-012。

<sup>69</sup> 「蔣中正電顧祝同令浙東浙西前方部隊撤轉諸暨至龍游等地並配置山砲兵以截擊敵之後續補充部隊」（1942年5月19日），〈領袖指示補編（十六）〉，《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6-182。

<sup>70</sup>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188。

<sup>71</sup> 「蔣中正電顧祝同指示衢州決戰如何據守及遲滯日軍」（1942年5月16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4-012。

作戰計畫，重新制訂衢州決戰方案。在這個方案中，最重要的改變，也是唯一具有戰略意義的部署，就是如圖3左下方所示，將王耀武74軍、王鐵漢49軍及丁治磐26軍，分別置於衢州的南、北及西三面。由於地形緣故，衢州南、北及西面皆為山嶺，東面地勢平坦，且衢州西面為衢江、信安江及烏溪江三江交匯處，日軍勢必從衢州東面沿浙贛鐵路進逼，在顧祝同重新端出來的作戰計畫裡，很明顯地是要以守城的86軍吸引日軍主力，在相持不下、陷入膠著時，再讓王耀武、丁治磐及王鐵漢軍從南、西及北面共同包圍聚殲日軍。<sup>72</sup>



圖3、顧祝同「衢州決戰部署要圖」（1942年5月18日）

資料來源：「顧祝同電呈蔣中正衢州決戰腹案」（1942年5月18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4-013。

<sup>72</sup> 「顧祝同電呈蔣中正衢州決戰腹案」（1942年5月18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4-013。

雖然臨場變陣是兵家大忌，但第三戰區的應變仍可謂迅速明快，國軍主力也未在金華、蘭谿等地受到重創。為了應付即將到來的激戰，守城的86軍自1942年2月初進駐衢州城，為了修築城防工事與衢州機場，在三個月內大量徵用民伕與木、石等建材供應。67師師長陳頤鼎坦言城內雖有一個月的食米存糧，但蔬菜、食油與肉類全無儲存，守城官兵毫無副食品供應，部隊常有紀律廢弛，任意搶劫居民食物的行為，陳頤鼎迫於現實難以解決，也只能裝聾作啞。<sup>73</sup> 軍長莫與碩更在5月20日下令城內4萬居民在三日內全數撤出城外，地方當局並沒有任何具體作為幫助百姓撤離，實際上等於強迫百姓為難民。

5月27日，日軍攻下衢州前方約40公里處重鎮龍游，日軍進攻衢州的道路上，已是一馬平川、毫無阻礙，從5月27日至6月2日，日軍逐步清除衢州外圍的國軍陣地，6月3日，日軍正式發起對衢州城防的進攻。此時固守衢州的86軍，共計兩個師的兵力，以衢江為界，衢江以北為16師防地；衢江以南由67師固守。經過一整日的激戰，日軍突破衢州東北及東南國軍陣地，自3日深夜起，天空下起了滂沱大雨，日軍第15師團在聽到雷聲後，明快下令強渡衢州城外的最後一道天然屏障烏溪江，日軍前鋒已抵衢州城下。<sup>74</sup>

衢江北岸的16師陣地在經過日軍的數波攻勢下連告失守，軍長莫與碩藉口出城收攏16師殘部，竟擅自先離開衢州，與16師師長曹振鐸、67師師長陳頤鼎失去聯繫，莫一走，衢州城防更加群龍無首。由於這波傾盆暴雨，造成衢州六十年一遇的大洪水，衢江、新安江及烏溪江均溪水暴漲，無法橫渡，日軍進軍受到暴雨及溪水巨大的阻礙。但同樣地，日軍也觀察到國軍雖然有自衢州南面增援的跡象，但行動緩慢，第13軍司令官澤田茂對此認為老天爺是公平的，正所謂天道酬勤者：「天不偏袒於某一方，敵方之行動亦因洪水而深受阻礙。」<sup>75</sup>

從6月4日至6日，守城86軍67師依托衢州城牆及護城河為屏障，沿城門附近

<sup>73</sup> 陳頤鼎，〈衢州保衛戰親歷記〉，《閩浙贛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親歷記》，頁358-359。

<sup>74</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華中方面軍作戰「派遣軍作戰」(一)》，頁264-265。

<sup>75</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華中方面軍作戰「派遣軍作戰」(一)》，頁264-265。

的據點工事，與日軍進行激烈的逐巷逐戶的激戰。6日更是下起整日的暴雨，經過四晝夜的激戰，67師陣亡官兵已達2千2百多人，幾占全師戰鬥兵員的三分之一強。6日上午8時日軍第15師團占領衢州機場，並攻破衢州城的北門、大南門及中南門，但67師仍據守城內各陣地工事，澤田茂也向大本營回報：「雖致力於擴張戰果，但城內的中國軍仍作頑強之抵抗，致無法輕易突入城內。」<sup>76</sup>

此時如照第三戰區的原定衢州作戰計畫，守城86軍在經過數日的堅守激戰，消耗日軍的強弩兵鋒後，隱蔽於衢州外圍的49、74及26軍應該要審時出擊，內外夾攻日軍。但陳頤鼎卻在此時收到密探送來第10集團軍總司令王敬久轉達蔣中正的撤退密令：「令陳師長頤鼎七日夜間應即由江山港與常山港中間地區或其他敵軍薄弱處突圍為要。」<sup>77</sup> 收到命令的陳頤鼎在第一時間舉棋不定，他內心的疑惑是最高統帥部的決策既是在衢州決戰，日軍已被守軍拖住，正是內外圍殲的大好時機，為什麼反而要下令突圍？他立即召集各部商議，眾人皆主張按指示撤退，於是86軍在大雨滂沱的6月7日凌晨，拋棄所有重武器、騾馬、車輛輜重與不堪行走的傷員，留下16師謝士炎團掩護大部隊撤退。各部沿烏溪江南岸脫離日軍包圍，在8日黎明順利撤退至衢州城南大洲鎮附近的74軍57師陣地，86軍在安全轉移陣地後開赴福建浦城休整，陳頤鼎感慨籌劃多時的衢州保衛戰，就這樣虎頭蛇尾地草草結束了。<sup>78</sup>

重慶統帥部原本一再三令五申的衢州決戰，嚴格要求各部將領「不得擅離其部隊，否則即視為畏戰逃避，應照連坐法處治」。<sup>79</sup> 更曾數次電令衢州86軍守將莫與碩、陳頤鼎、曹振鐸等人：「此次衢州會戰，關於黨國之存亡者甚大，該軍守衛衢州責任最重，務希重申連坐法，督率所部上下一致，誓與衢州共存亡，決

<sup>76</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華中方面軍作戰「派遣軍作戰」(一)》，頁264-265。

<sup>77</sup> 「蔣中正電令陳師長頤鼎七日夜間應即由江山港與常山港中間地區或其他敵軍薄弱處突圍為要」(1942年6月7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4-051。

<sup>78</sup> 陳頤鼎，〈衢州保衛戰親歷記〉，全國政協《閩浙贛抗戰》編寫組編，《閩浙贛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親歷記》，頁361-363。

<sup>79</sup> 「蔣中正電願祝同指示各部將領不得擅離其部隊否則即視為畏戰逃避應照連坐法處治」(1942年5月29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4-051。

心犧牲以報黨國，實現主義，完成使命，是所切盼。」<sup>80</sup> 他的鐘擺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動搖？研究者根據蔣中正在日記裡的內心轉折，判斷他應是在5月27日開始認真思考衢州決戰已無必要：<sup>81</sup>

敵軍抽調在華各地戰區精強部隊約五萬人，集中於浙東，進攻我衢州等處之空軍根據地，勢在必得，而滇西怒江西岸騰衝一帶殘敵僅千餘人，頑強負隅。余乃注全神於此，雅不欲調美空軍志願隊赴援浙東，而留其在滇協助我陸軍肅清滇西之殘敵。蓋以今日情勢而論，後方重於前方，尤其滇西不能不從速肅清。至於金、衢之得失，已不關今日戰局之勝負。<sup>82</sup>

到了6月2日，日軍發動衢州攻勢的前夕，蔣中正放棄衢州決戰的想法更加明朗：「敵軍調其在魯之第卅二師，在冀第一一〇師，到浙東參戰，而且南昌與廣州之敵，皆自一日起發動攻勢，牽制浙東戰爭，我為政略計，固應放棄衢州，萬不可以無關緊要一地之得失，爭一日之榮辱，而致忘最後成敗之大計也。」<sup>83</sup> 當6月3日，日軍發起對衢州的攻勢後，蔣中正與軍令部徐永昌、劉斐等人於曾家岩舉行的作戰會報中，經過一番討論後，與會眾人大多支持蔣放棄衢州會戰的決定，其主要理由是：（一）原判斷日軍攻衢只會動用三個師團，但其後尚有兩個師團，大出意料之外；（二）節用械彈，避免日後無法補充；（三）衢州已無太大戰略價值；（四）如國軍在浙贛會戰中損失過大，將更無以防制日軍深入浙贛路。<sup>84</sup> 最終蔣在6月3日作出放棄衢州決戰的決定：

本日為浙衢會戰與否之方針，未能決定，故憂慮殊甚。過去經歷，往往為一時毀譽得失，而貽誤戰略，且致政略失敗，此鑒於北平、南京，以

<sup>80</sup> 「蔣中正電陳頤鼎等衢州會戰關於黨國存亡者甚大該軍守衛衢州責任最重務希重申連坐法」（1942年5月25日），〈領袖指示補編（十六）〉，《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6-177。

<sup>81</sup> 張力，〈從決戰到棄守：浙贛會戰衢州戰役蔣介石的抉擇〉，收入陳紅民主編，《中外學者論蔣介石》，頁119。

<sup>82</sup> 《蔣中正日記》，1942年5月27日。

<sup>83</sup> 《蔣中正日記》，1942年6月2日。

<sup>84</sup> 徐永昌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六冊，1942年6月3日，頁417。

及此次緬甸進退守棄之教訓，尤為寒心。故對於衢州方略，決心放棄會戰，以敵軍抽集在華各戰區最大限度之兵力，與其空軍之掩護，進攻衢州大機場所在地，志在必得，若我與之決戰，不僅無甚意義，而且徒耗兵力，不易補充也。不如放棄決戰，使之撲空，不能達成其擊破我主力之目的，而且保全我實力，猶可屏障贛湘也。乃徵詢眾謀，僉同此意，故於晚間下令實施，總以不使敵軍在東北之部隊調移於關內，此為唯一之要略也。<sup>85</sup>

## 伍、浙贛會戰的最後階段——從浙贛路 打通作戰到日軍撤退

86軍在經過四晝夜的激戰後，在收到突圍的命令後分批撤退。6月7日上午，最後負責斷後的86軍16師謝士炎團殘部從衢州東南方突出重圍，日軍完全占領衢州。此時雲集於衢州周圍的國軍按照重慶統帥部避免決戰、保存戰力、機動打擊敵人的意圖，逐步向衢州以西浙贛路兩側地區轉進。日軍則決定乘勝追擊，不讓第三戰區有喘息的機會，在原先摧毀衢州、麗水機場及殲滅國軍有生力量的預設目的外，進一步決定擴大打通浙贛鐵路全線，摧毀仍未捕捉到的國軍主力，尤其是74軍、26軍及49軍，以及大肆奪取鐵軌資材及破壞鐵路等各種軍需設備的戰略目標，特別是打算長期控制金華周遭地區所蘊藏的豐富螢石礦脈。螢石對於日本本土的製鋁及鋼鐵等重工業，具有不可或缺的战略價值。

日軍以第15、22及116師團繼續沿浙贛路西進，第三戰區以第10集團軍在江山地區、第32集團軍在玉山地區擔任防禦任務。然日軍6月9日率先攻陷常山，11日占江山、玉山，14日攻陷贛東重鎮——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上饒。<sup>86</sup>

<sup>85</sup> 《蔣中正日記》，1942年6月3日。

<sup>86</sup> 據顧祝同的說法，早在浙贛會戰一開始，第三戰區就判斷日軍有打通浙贛全線、奪取上饒的企圖，於是自5月下旬起即將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所轄各機構分別遷往閩北及贛南，例如司令長官部及直屬機構即遷往閩北建陽，原在廣豐的中央軍校第三分校則遷到贛南瑞金。撤退過程中更是屢遭日機轟炸，以致沿途所攜車輛及物資被毀棄者甚多。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頁220-221。

日軍占領上饒後，暫時停止攻勢，以確保已占領地區並擴大戰果。而在日軍第13軍主力西進的同時，從華北前來支援的小蘭江混成旅團則向浙東地區進犯，24日攻陷麗水，在徹底破壞麗水機場後，於7月9日沿甌江進占青田，11日再占溫州。同時，日軍海軍陸戰隊於12日在溫州登陸，13日進占瑞安，控制了浙東沿海北至寧波、南至溫州的各港口重地。<sup>87</sup>

為了策應第13軍浙境作戰，駐紮於南昌的日軍第11軍於5月底由南昌沿撫河西岸向南攻擊，6月2日攻陷進賢。由於第三戰區各軍在金蘭戰役到衢州戰役中，均遭到輕重不一的損傷，此時尚未與日軍接戰的生力軍，僅餘劉廣濟100軍，因此，第三戰區下令由100軍負責浙贛路西段從上饒到鷹潭沿線各要地的防務，其中的防守重點在浙贛路上的重鎮鷹潭。如果鷹潭失守，從浙贛線西段一路西進的日軍第11軍，將可輕易地與自上饒東進的第13軍會合。

日軍第11軍在控制鄱陽湖及信江水路交通後，15日繼續攻占崇仁、宜黃、臨川並搶渡信江。由於國軍第100軍建置分割太甚，各部多以團為單位，分散至鷹潭周圍的貴溪、橫峰、金溪、南城等地駐守，且軍長劉廣濟的指揮所與各部間的聯繫嚴重不足，當優勢日軍自進賢出發，沿浙贛線一路東進的過程中，100軍根本無法迅速集結，形成有效的打擊力量。<sup>88</sup> 日軍於16日分別從側翼襲擊，一舉攻陷鷹潭，25日再陷弋陽，7月1日，第13軍與第11軍會師於浙贛線上的戰略要地——位於上饒以西的橫峯，至此日軍已完全打通並控制了浙贛鐵路全線，可說達成了此一階段所預設的作戰目標。

從6月16日至8月14日，是日軍所設定浙贛會戰的第三期作戰，日方也稱之為駐留作戰。在此一階段的浙贛線打通作戰中，國軍雖然在許多據點上仍有若干抵抗，但展現出來的作戰意志卻較金華戰役及衢州戰役更為低落；由於放棄衢州

<sup>87</sup> 由於國軍在此階段欠缺設定如同金蘭戰役及衢州戰役的明確作戰目標，雖對日軍仍有一定的襲擾及牽制，但並未改變日軍的進軍路線並達成其作戰目標。因此，本節以下有關從浙贛路打通作戰到戰役結束的敘述，主要參考並簡要彙整自下列書籍：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浙贛會戰》，頁49-77；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下卷，頁990-1007。

<sup>88</sup> 「願祝同電蔣中正遵由劉廣濟指揮行署縣府一週內完成撤退並破壞樂平貴谿金谿南城以西道路」（1942年5月19日），〈領袖指示補編（十六）〉，《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6-157。

決戰，是重慶最高統帥部突如其來的決定，守軍顯然是在一片慌亂中倉皇退出衢州，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也自承撤退過程中的意外損失，甚至不遜於戰場上的戰鬥傷亡。此後不論是最高統帥部或是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都沒有再為浙贛會戰訂出明確的作戰目標。從這個角度來看，棄守衢州後的第三戰區國軍，陷入了一種戰鬥目標不明的混沌狀態。如依照徐永昌及顧祝同的說法，最高統帥部的決策是考量到如國軍在衢州決戰中損失過大，將無以防制日軍深入浙贛路，那第三戰區接下來的接戰重點，就應該是將國軍轉移至浙贛線上各要點據險防守，並伺機隱蔽出擊，不斷襲擾位在明處的日軍，阻止日軍打通浙贛路。

第三戰區的確也是按此規畫，將轄下各軍分散至浙贛路西段周圍各地防守。然而，就戰鬥過程來看，浙贛線上各據點的國軍往往甫一接戰、即棄守陣地。根據第三戰區的報告，其中只有74軍的戰鬥表現最能達到隱蔽出擊的作戰要求，26軍差強人意，其他各軍皆不甚理想。從6月16日起，74軍將轄下51師及57師分散配置在上饒東南方的五峰山區駐守，據第三戰區向重慶統帥部的作戰電報，大加讚譽該軍能確實執行以「伏擊為有效之戰法，須極端隱蔽與耐守。如74軍埋伏小部隊於五峰山山地約一周之久，待敵通過埋伏圈時，四出奇襲，殺傷敵人四百之多」。<sup>89</sup> 顧祝同也在另一個第三戰區全體人員出席的場合，公開表揚74軍堅毅死守五峰山的戰鬥精神，足堪為全體國軍的表率。<sup>90</sup> 或許顧祝同的讚揚，不無溢美之可能，但從6月下旬起王耀武多封連續致蔣中正的急電，詳細陳報74軍在五峰山區諸役作戰的傷亡數字，不難想見戰況之激烈。<sup>91</sup>

然而，僅依賴74軍、26軍等部隊在少數點與線間的襲擾伏擊，而無法形成面的打擊攻勢，對於阻撓日軍的攻勢影響極其有限。<sup>92</sup> 更致命的是此時最高統帥

<sup>89</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三）（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頁569。

<sup>90</sup> 顧祝同將軍紀念集編輯小組編，《顧祝同將軍紀念集》（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8年），頁255-265。

<sup>91</sup> 「王耀武電蔣中正報告74軍6月份傷亡情形」（1942年7月2日），〈八年血債（五十一）〉，《蔣檔》，典藏號：002-090200-00074-186；「顧祝同電蔣中正轉陳王耀武報74軍51及57軍於五峰山區作戰之綜合戰報」（1942年7月5日），〈八年血債（五十一）〉，典藏號：002-090200-00075-077。

<sup>92</sup> 除了74軍外，顧祝同只提到了26軍亦在上饒西北方的象鼻山附近伏擊，給予日軍一定的傷亡。顧祝同將軍紀念集編輯小組編，《顧祝同將軍紀念集》，頁258。

部錯誤判斷日軍有從湖南、江西、廣東等三面進攻第九戰區重鎮衡陽之企圖。7月12日，蔣中正電令顧祝同，將王耀武、丁治磐兩軍調離轉移至湘省境內的粵漢路增援，以防日軍進攻衡陽。<sup>93</sup> 雖然顧祝同一再向蔣中正表達嚴正的反對之意，這也是第三戰區難得反抗統帥部意旨的表現，顧強調第三戰區各軍多已殘破，更無一支完整的戰鬥預備部隊，尤其在原先負以重任的100軍一戰即潰後，74軍及26軍已是浙贛路上饒以西之線最重要的守備力量，再三懇請勿將該軍調離。<sup>94</sup> 不過，7月18日，49軍仍依照既定指示接替74軍防務陣地後，74軍即開赴浙江與福建交界的建陽、浦城整訓。<sup>95</sup> 日軍的情報部門在第一時間也查探到74軍即將離開前線的情資，日方更據此判斷：「由此可知，敵方之戰意已全然消失。」<sup>96</sup> 在戰鬥力最強的74軍脫離第三戰區的戰鬥序列後，期待第三戰區隱蔽出擊的反攻，難以避免地更趨於消極。

雖然在此一階段第三戰區各軍仍對日軍有著一定的襲擾及牽制，但整體而言並未扭轉日軍的進軍動向及作戰目標。從澤田茂的戰地紀錄裡，曾一再評論此時期國軍頗為消極之應戰態度：「敵逃走之快令人折服」、「當面之中國軍始終採取迴避戰法，未見其抵抗」、「中國軍一再逃避，令人失望」等。<sup>97</sup> 日軍甚至將此浙贛線打通作戰，形成為如同執行例行任務般的「旅次行軍」，並譏諷第三戰區國軍「全然無所作為地退避」。據日軍戰後的戰果詳報來看，日軍幾乎是在損

<sup>93</sup> 「蔣中正電顧祝同指示調動王耀武丁治磐兩軍轉移至湘省境內粵漢路增援」（1942年7月12日），〈領袖指示補編（十六）〉，《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6-021；「蔣中正電顧祝同指示調動王耀武丁治磐兩軍轉移至湘省境內粵漢路增援」（1942年7月12日），〈交擬稿件—民國三十一年七月至民國三十一年九月〉，《蔣檔》，典藏號：002-070200-00015-009。

<sup>94</sup> 「顧祝同黃百韜電蔣中正勿將74軍調離現地」（1942年7月13日），〈領袖指示補編（十六）〉，《蔣檔》，典藏號：002-070106-00016-022。

<sup>95</sup> 顧祝同曾一再電請蔣中正收回成命，希望蔣打消調離74軍的念頭，但蔣仍堅持要王鐵漢49軍接替74軍的駐防地點，並限7月25日前完成交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浙贛會戰》，頁72。

<sup>96</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華中方面軍作戰「派遣軍作戰」（一）》，頁312。

<sup>97</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華中方面軍作戰「派遣軍作戰」（一）》，頁302、311-312。

耗極少的情形下完成作戰任務。<sup>98</sup>

7月18日，日軍大本營下達結束浙贛會戰的命令，鑒於發動此役摧毀衢州機場、打通浙贛全線、打擊第三戰區戰力及掠奪軍需物資的目的已經達成，下令自8月中旬起恢復原有態勢，且為防範國軍未來再次修復衢州機場，及確保控制金華所在地的螢石礦脈，留下一部繼續占領金華。於是日軍第13軍及第11軍自8月19日起開始分批撤退返回原先陣地，前後歷經近五個月的浙贛會戰遂告結束，除了金華一地之外，國軍收復了所有失土，中日兩軍在浙贛前線又恢復了如同浙贛會戰前的對峙局面。<sup>99</sup>

## 陸、國軍內部對於浙贛會戰的自我檢討

戰爭是零和遊戲，必然有勝利與失敗者，日軍掌握了浙贛會戰的主動權，達成戰前所設定的戰略目標，並在取得戰鬥成果後迅速返回原陣地。日軍在浙贛會戰後也對第三戰區的表現做出了如下觀察：是役完全暴露了中國軍在協同作戰、獨斷專行、缺乏鬥志、通信聯絡等方面的嚴重弱點。<sup>100</sup> 如果說日軍是不折不扣的勝利者，那國軍理應是失敗的一方，然而國軍卻從未承認是這場戰役的戰敗者，從最早軍令部戰史編纂委員會所編《抗日戰史》（柏溪稿）即謂：「參加會戰之各部隊於浙東方面恢復5月中旬金蘭作戰以前之態勢，贛東方面亦恢復5月下旬以前之態度。至於牽制敵軍多數兵力，使其不能抽調轉用（太平洋及緬甸戰場），尤為本會戰之至大成果。」<sup>101</sup> 另一套流通甚廣由蔣緯國主編《國民革命戰史》，則強調蔣中正放棄衢州決戰的正確戰略：「日軍調集9個師團以上之兵力，實施

<sup>98</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華中方面軍作戰「派遣軍作戰」(一)》，頁312、338。國軍消極的作戰意志，甚至影響了一般民眾對於戰爭的悲觀態度。澤田茂就提到在攻占江山後，他發現當地軍民均認為日軍或將永久駐留，故一般民眾頗多秘密地向日方請求予其組織治安維持會云云。同上書，頁316。

<sup>99</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華中方面軍作戰「派遣軍作戰」(一)》，頁360-361。

<sup>100</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華中方面軍作戰「派遣軍作戰」(一)》，頁448。

<sup>101</sup>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浙贛會戰》，頁2。

浙贛會戰，以破壞浙江飛機場，並乘機掠奪物資，其作戰目的雖告達成，但在太平洋作戰重要關頭之際，無論兵力及時間上均感浪費，實屬得不償失。反之，軍事委員會明察全局，斷然命令第三戰區避免衢州決戰，保全戰力繼續不斷襲擾日軍，迫其撤退，決策極為正確。」<sup>102</sup> 1980年代後期史政編譯局新編的《抗日戰史》除原有論點外，亦高度肯定蔣中正放棄衢州決戰的決定：「先機加強第三戰區之兵力，於會戰其間，復令第三戰區避免衢州決戰，遂得保全戰力，繼續不斷襲擾，牽制敵人，誘致敵主力於該方面，無所作為，進而消耗其兵力，浪費其時間，不僅迫敵徒勞往返，再退回原陣地，並使敵前後牽制，在中途島及瓜達康納爾島慘遭敗績，無力大舉侵華，遂容我軍得以安全渡過此一最艱險時期，誠為最英明之決策與卓越之戰略。」<sup>103</sup>

簡而言之，國軍方面的戰史書寫認為第三戰區國軍在統帥部的指揮下，面對優勢日軍兵鋒，當機立斷放棄硬碰硬的衢州決戰，不但有效保全了國軍主力，持續襲擾、消耗日軍，且日軍既然退回了原先的浙北占領區，表面上國軍在浙贛會戰後除金華一地外，並沒有增加任何失土。國軍對於戰役成敗的衡量標準，可由戰時一句人人琅琅上口的口號：「守土有責」盡覽無遺，只要戰役最終沒有丟失領土，國軍就算不辱使命、達成目標。

究竟我們應該如何掌握國軍內部對於浙贛會戰的真實態度，最好的方式或許還是回到戰爭剛結束的當下，尤其是肩負浙贛會戰成敗重任的第三戰區的自我檢討。當7月底尚在酣戰之際，顧祝同即電蔣中正為此次浙贛會戰失利，自請懲處：「此次浙贛戰役時，俱遵照指示與敵應戰，終以計畫變更，諸種準備……未及適時完成。大軍轉移之際，適值霪雨、路崩橋圯，行軍極感困難，以致影響士氣，並損失一部物資。且因地方黨政機關規避責任，先期疏散，致發生少數離散士兵敗壞紀律情事，經嚴令整飭，設法提高士氣，收拾民心，並加強黨政軍連繫，目前已漸臻安定。」<sup>104</sup> 顧氏將浙贛會戰未盡理想的戰鬥結果，主要歸咎於兩

<sup>102</sup> 蔣緯國，《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8卷（臺北：黎明文化，1978年），頁16。

<sup>103</sup>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湘贛地區作戰（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年），頁96。

<sup>104</sup> 「顧祝同電蔣中正稱浙贛會戰失利督導未周擬請從嚴懲處」（1942年7月24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4-061。

點：第一是作戰計畫的一再變更，前線部隊難以迅速調整部署，加上暴雨不斷的惡劣氣候，以致造成許多不必要的損失；其次是地方民政機關沒有盡到應有的配合責任。顧祝同的說法自有其道理，但他對自己及轄下部屬的檢討不多，卻似乎有意無意間將戰敗的主要責任，指向最高統帥部及地方文職機關身上。因為作戰計畫的變更，都是受命於統帥部的指示，第三戰區在這個過程中只是聽命行事的作戰單位，而轉進過程中種種騷擾民間、軍紀不彰的亂象，顧氏雖直言不諱，卻暗指地方黨政機關率先疏散撤離，更要為此負起較大的責任。

除了顧祝同個人向蔣中正自請懲處外，1942年10月24至27日，浙贛會戰結束後，顧氏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的臨時駐所——福建建陽，召開了一場針對浙贛會戰的檢討會議，幾乎所有第三戰區轄下的軍政主管人員約1百餘人，均參加了此次會議。<sup>105</sup> 顧祝同在開幕式中，首先拋磚引玉對全體與會者發表一篇題名為「浙贛戰役的檢討」講詞，詳細羅列第三戰區在浙贛會戰中的優劣點與亟待改進之處。<sup>106</sup> 經過四天的會議討論後，第三戰區會後彙集呈報軍令部，一份厚達10餘萬字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工作報告」，內容分為作戰、整訓、特工、補充、經理、交通、通信等七章，詳細羅列了第三戰區在浙贛會戰的戰鬥過程、戰爭結束後各部隊的整訓補充，以及經理補給等後勤體系的重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總結浙贛會戰各作戰部隊所提意見的綜合檢討：

- (一) 贛江東岸為第三、第九戰區接合處，事先無統一指揮機構，又無空置部隊，第九戰區夏楚中軍，東調臨川行動較預定為遲，倉卒應戰。又孫渡軍因與夏軍未受統一指揮，致減協同作戰之效。
- (二) 大兵團之作戰，態勢重於戰鬥，準備重於實施，後方重於前方，決心既定，部署需時，屢次變更，後方諸處置不易配合，轉進時尤然。
- (三) 道路破壞應事先長時間發動，方能收效，待敵迫近臨時指示，民眾已相率逃亡，根本不易實施，此次衢州以東，破壞較為徹底，

<sup>105</sup>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工作報告—浙贛會戰之作戰檢討」（1942年11月），〈第三戰區工作報告、第三戰區第四次軍政座談〉，《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全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1/543.3/8822。

<sup>106</sup> 顧祝同將軍紀念集編輯小組編，《顧祝同將軍紀念集》，頁255-265。

衢州以西則相差甚遠。

- (四) 陣地工事，須有適合兵力，尤須留有強大之預備隊，以便逆襲及轉移攻勢，自身不僅要抗敵，而且要能掩護本身出擊，方能支持時日，以待會戰有利時機。
- (五) 日軍近來採取反清野戰法，裹脅民伕，每到一地即洗劫財物穀米，使我再對敵掃蕩或出擊時，物資缺乏，困難叢生，故無論部隊大小，對重要據點，均以不輕易退出為宜。
- (六) 日軍在此次戰役中，對滲透戰術的運用，更見活躍，其要點在使用訓練良好之便衣隊，分散於其主力前方，半日至一日行程左右，到處鑽隙迂迴，同時以低空攻擊機，實施襲擊擾亂，及破壞我交通通信等工作，其後則隨之搜索部隊，相機支持其戰鬥，最後則以主力部隊，迅速利用其成果。<sup>107</sup>

在這份綜合檢討裡，可以看出第三戰區內對於浙贛會戰之所以作戰不力，指向四個重點方向：首先是各軍由於橫向聯繫不足，缺乏協同作戰的意識，以致防守在各據點的國軍部隊，泰半淪為困守不支或不戰而逃的局面。尤其是在江西省境贛江東岸的作戰，雖然有第九戰區夏楚中79軍及孫渡58軍的支援，但在各戰區的本位主義心態下，雙方並未建立統一的指揮機構，以致各自為戰，遭日軍各個擊破。其次是延續顧祝同所強調的，由於作戰計畫的一改再改，使得前線部隊無法及時應變，加劇戰局的惡化。第三則是針對浙贛會戰中的焦土作戰，認為道路的破壞應及早進行，待日軍迫近時，當地駐軍及民眾已相繼逃亡，根本無法實施。第四則是肯定日軍在浙贛會戰中所採用的新策略與新戰法，即善用密探滲透及堅壁清野的戰術，第三戰區總結日軍在浙贛會戰與此前戰役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廣泛利用能操華語的便衣密探，先行滲透至國軍防守據點，進行各種破壞交通及通信工作，最後才以主力部隊一舉而下。而此役日軍每攻下一地，即將該地的糧食財物搜括殆盡，並大量強徵民伕，不但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且造成第三戰區部隊在日後反攻時，所奪回的失土都是物資遭劫掠一空，百廢待舉的劫後城鎮，更平添戰後復原的難度。

<sup>107</sup>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工作報告—浙贛會戰之作戰檢討」（1942年11月），〈第三戰區工作報告、第三戰區第四次軍政座談〉，《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全宗》，檔號：B5018230601/0031/543.3/8822。

另外，在這份工作報告中還有一件針對第三戰區參與浙贛會戰各部隊及各兵站後勤單位的具體優劣評比：（一）作戰最優者：74軍。此次浙贛會戰以隱蔽出擊為主要應戰方式，然而要發揮成效，必須確實做到極端隱蔽部隊行蹤與堅忍的防守意識。第三戰區各軍在隱蔽出擊、伺機伏擊日軍上，均表現得不甚理想，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特別表揚74軍在6月下旬長期埋伏於上饒東南側的五峰山地，待日軍經過時發動奇襲，造成日軍的重大傷亡。（二）作戰最劣者：暫9軍、88軍及轄境內之游擊部隊。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認為負責錢塘江右岸地區守備任務的暫9軍及88軍在日軍進逼下，一經接戰即退出防區，作戰最為不力；地方上的所有游擊部隊，不但虛耗糧餉，反有損於民心士氣，痛責其不但徒滋紛擾，且對戰事毫無貢獻。<sup>108</sup>（三）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坦承除了作戰部隊未能善盡隱蔽出擊的任務外，各地負責鎔重及糧食調度的兵站亦極不健全，以致前線還在激戰，後方兵站人員眼見苗頭不對，就已星散一空，甚至隨意放棄糧食及彈藥等補給物資，這方面的損失更甚於戰場上的破壞；亦不諱言軍隊到處拉伕，嚴重影響民心與軍紀。（四）正如顧祝同在前電中所述，地方民政黨政機關率先疏散撤離，更應為大局糜爛負起責任。第三戰區在這份檢討中，改採了一種較為溫和的說法：「戰場上凡百措施，均應以軍事為中心。如兵役、糧政、民眾組訓及經濟、政治、黨務諸措施，均應密切配合，以求軍事上之便利。如各自為政，則難收綜合之威力。」<sup>109</sup>言下之意，顧祝同雖不否認第三戰區在會戰過程中的領導無方，但該戰區在浙贛會戰中，與地方民政、糧政及黨務組織之間，缺乏有效的橫向聯繫，以致於日軍壓境時，地方機關人員往往率先潛逃一空，平添第三戰區國軍部隊轉進時的困難。

以下將從顧祝同與第三戰區自我檢討的兩個究責重點，即統帥部作戰計畫的

<sup>108</sup> 在報告中記載的是19軍，但19軍並無參與浙贛會戰，亦不屬於第三戰區轄下的部隊，故推測應為與88軍共同負責浙東防務的暫9軍之誤。「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工作報告—浙贛會戰之作戰檢討」（1942年11月），〈第三戰區工作報告、第三戰區第四次軍政座談〉，《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全宗》，檔號：B5018230601/0031/543.3/8822。另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三），頁569。

<sup>109</sup>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工作報告—浙贛會戰之作戰檢討」（1942年11月），〈第三戰區工作報告、第三戰區第四次軍政座談〉，《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全宗》，檔號：B5018230601/0031/543.3/882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三），頁569。

一再變更，以及地方黨政及民政機關的失職，分別加以闡釋。事實上，從蔣中正事後在日記裡的反省，他其實頗為後悔，的確在一定程度上，第三戰區的部隊實力因避免決戰而未大傷，但在混亂中匆忙撤軍，除了造成不必要的額外損失外，更對部隊心理打擊甚大，這種無形的心理挫傷，更甚於有形的武器損失。<sup>110</sup> 蔣在浙贛會戰尚正酣戰之際，即對棄守之事有所反省：

此次浙贛線會戰，始則嚴令在衢州城決戰，既以敵方兵力厚集，乃於臨時改變方略，不令決戰，放棄衢州城防。然而其時敵已逼近衢州，且通常山、玉山之後路，已被敵人截斷，守城部隊與砲兵不易撤退，而顧長官猶不即下令撤防，以致守城部隊已被敵包圍之外，又被洪水之困，乃至冒險突圍，而損失難計，因之全軍心理猶〔游〕疑，戰鬥精神低落，而其結果之損失程度，過於決戰後之犧牲，而官兵心神之低落，此種無形損失，更不可量計。經此次教訓之後，凡決心決戰準備完成，待敵逼近時，即再不可變更初衷也。<sup>111</sup>

是年年底，蔣在年終自我檢討時，仍因浙贛戰事中自己的「指導無方，決心不堅，以致遭受無益之損失」而悔恨不已。<sup>112</sup>

如果說放棄衢州決戰，是為了實現之後的戰略調整，將國軍主力轉移至浙贛鐵路西段的兩側山區，透過隱蔽游擊的方式，不斷襲擾日軍，迫使日軍無功而返，達成最終戰勝目標。那就不應以事後諸葛的角度，將蔣的放棄衢州決戰策略說成是一無是處，此一決策的問題出在當最高統帥部放棄了衢州決戰後，第三戰區部分國軍就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任由兩路日軍打通並會師浙贛路，並在掠奪各項戰略物資後從容返回。

關於蔣中正在浙贛會戰中的指揮作戰，衢州戰役無疑是一重大分水嶺，在5

<sup>110</sup> 67師師長陳頤鼎是衢州守軍最高指揮官，他就說道當接獲撤退命令時，他的疑惑與不解是：「眼前敵軍已將我們圍困得像鐵桶一樣，水泄不通，就是撤走，成功的希望不大，更不忍心將幾百名重傷員遺棄在這裡，他們的後果是悲慘的，如何對得起這些久共生死的袍澤。」陳頤鼎，〈衢州保衛戰親歷記〉，全國政協《閩浙贛抗戰》編寫組編，《閩浙贛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頁362。

<sup>111</sup> 《蔣中正日記》，1942年7月16日。

<sup>112</sup> 《蔣中正日記》，1942年總反省錄。

月15日到6月3日間，他每日都數電、甚至數十電指示顧祝同及前線將領。但在6月7日衢州撤退後，蔣就幾乎沒有再對顧祝同做出任何具體的戰略與戰鬥指示，也幾乎很少再發電子第三戰區前線將領。對於蔣中正前後冷熱不一的反應，倒是可以從同一時間的緬甸戰事得窺一二。軍令部次長劉斐在4月30日對徐永昌表示，他所觀察到蔣中正在緬甸戰事的指揮風格：「委員長如下圍棋者，然看已輸事，將棋子一扔。因過去對緬作戰，十之八、九由委員長直接指揮，僅將電稿交示而已。」<sup>113</sup> 劉斐之意是指戰局大壞之際，蔣中正才讓軍令部有更多的參與指揮部署，但往往時機已逝，戰局已難扭轉。同樣地，身處第一線的丁治磐也有類似的觀察，不過他針對的對象，是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的參謀人員，他認為此次浙贛會戰，深受未有戰場經驗之幕僚所累，兵力過度分散，以致讓日軍各個擊破。<sup>114</sup>

至於地方民政及黨政機關的責任問題，顧祝同及第三戰區的檢討，固然不能逕視為推卸諉過之辭，但從浙江省文職官員事後的心聲來看，第三戰區對他們的指責，實在也是強人所難的苛求。浙省民政廳長阮毅成在開戰後一肩擔起省府人員的避難事宜，他身為浙江省府的第二把手，地位應屬重要，但其坦言他們這些文職人員從頭至尾對於第三戰區軍方的任何作戰計畫及行動皆一無所知，顯見第三戰區對於保護民眾身家性命財產的冷漠，且長期疏於與地方民政機關的橫向聯繫，他還是在數十年後看了國軍編纂的《抗日戰史》，才得知有所謂的衢州決戰計畫，在逃難的過程中，他們每一個人都像無頭蒼蠅一樣，走一步算一步。

當地軍方還會不斷隱瞞、甚至欺騙地方人士，從戰役之初即向阮毅成等人保證將會堅守金華、蘭谿一線，還好他未予輕信，仍率部眾撤至永康。當他剛抵永康時，駐金華之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李楚狂電話告知，金華、蘭谿守軍均已撤走，兩人在電話中感慨道：「所謂堅守金、蘭，阻止消耗敵勢，全係虛語。」<sup>115</sup> 最後阮毅成一行人撤退至已近浙南邊境的雲和，黃紹竑則逃至更遠處的龍泉，已

<sup>113</sup> 徐永昌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6冊，1942年4月30日，頁384。有關劉斐的這段評論，非常感謝本刊匿名審查人在解讀上的指導。

<sup>114</sup> 丁治磐感慨道：「此次作戰受無經驗之幕僚所策畫，兵力過於支分，與打麻將之折副子亂打相似，誠不易贏矣！」《丁治磐日記》，第3冊，1942年6月10日，頁207。

<sup>115</sup> 阮毅成，《八十憶述》，下冊，頁585。

是浙江境內退無可退的邊陲之地。在半個月的時間裡，浙東遭日軍占領者達三十縣，未曾遭日軍侵襲者只剩最南端的泰順、龍泉、雲和等數縣，日軍平均每日攻陷二至三縣。<sup>116</sup> 阮毅成語帶含蓄地說：「我軍撤退之速，且遠過於敵人之進展。」<sup>117</sup> 阮毅成還曾提及一件在逃難過程中，讓其啼笑皆非之事，當他最終撤退到雲和，一行人驚魂未卜之際，尚接到軍方來電，囑其：「國軍撤退，希發動當地民眾力量，自行保衛家鄉。」<sup>118</sup> 此時浙東全境已陷糜爛，幾無一片安樂淨土，他手上無一兵一卒，所謂保衛家鄉，真不知從何談起。

除了顧祝同及第三戰區針對浙贛會戰的自我檢討外，還有一個觀察的重點是重慶統帥部及第三戰區對於前線將領在浙贛會戰作戰表現的具體懲處。這方面主要集中在三個人身上，即擅自逃離衢州前線86軍軍長莫與碩、參謀長胡炎，及在浙贛線重鎮鷹潭防守失據、作戰不力的100軍軍長劉廣濟。三人在7月下旬被解送至重慶，由軍法執行總監部執行軍法審理，最後三人皆以不遵軍令的理由，被處以五年徒刑。<sup>119</sup> 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對於三名高階將領的不戰而逃，感慨道：「自抗戰以來，一般軍官在陣前殉職者少，在法庭受審者多，此真民族之恥辱也！」<sup>120</sup>

抗戰以來對於前線將領在戰場上的軍法懲治，泰半都是以違抗軍令作為裁量主要標準。但丁治磐卻有不同的觀察，他認為軍法審判時，量刑依據除考慮是否違反軍令外，更應該著重在「戰術原則之運用有無錯失，不僅以違誤命令為銜」，否則將領的指揮作戰能力不能進步，「雖殺百將，於軍事上亦屬無補」，故丁治磐認為抗戰期間蔣中正在軍法懲治的裁量原則，只強調是否違背統帥部的命令，而完全不注意戰術與戰略錯誤，對於改善國軍戰力毫無幫助。<sup>121</sup>

<sup>116</sup> 黃紹竑，《五十回憶》，中冊，頁455。

<sup>117</sup> 阮毅成，《八十憶述》，下冊，頁586。

<sup>118</sup> 阮毅成，《八十憶述》，下冊，頁586。

<sup>119</sup> 莫與碩等三人雖都判處五年徒刑，但至遲在1945年8月前都被提前釋放出來。莫與碩在勝利後出任軍事委員會派駐在廣東省的特派員，最後因重大貪污行為，於1946年9月被處決。他也是戰後在接收的過程中，被判極刑中軍職身份最高的一人。〈莫與碩〉，《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典藏號：129-090000-3869。

<sup>120</sup> 何成濬著，傳記文學雜誌社編輯，《何成濬將軍戰時日記》，上冊，1942年7月20日，頁133。

<sup>121</sup> 丁治磐，《丁治磐日記》，第4冊，1944年7月17日，頁176-177。

此外，最高統帥部對於第三戰區自顧祝同以降各級將領的檢討，幾乎都集中在軍紀與人事方面的問題。在浙贛會戰的當下，遠在湖北恩施的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即云：「浙江戰事不旬而失十餘城，軍無紀律，上下趨利，風雲一起，官搬私財，兵行劫掠，所聞如是，不無可信。」<sup>122</sup> 當然遠在數千里外的陳誠，並非親眼所見，也是二手消息的轉傳，未可盡信。但從蔣中正一而再、再而三的責難，第三戰區除了作戰的表現不佳外，更讓各界詬病之處，顯係各部軍紀渙散、走私搶劫不斷，民間怨聲載道。浙贛會戰後期蔣中正曾多次致電痛責顧祝同縱容部屬、領導無方，甚至連金華監獄的管理人員剋扣囚糧、奸宿女犯這樣芝麻綠豆的小事，都讓遠在兩千里外的蔣中正大動肝火。<sup>123</sup> 甚至對顧說出這樣的話：「本案〔按：指前述金華監獄之事〕如我不查究，你就任意縱奸犯法，直害國耳！豈從事革命者所應為，疲玩至此，誠堪痛心嘆息！」<sup>124</sup> 不過，浙贛會戰期間第三戰區部隊的軍紀敗壞，連自己人也毫不諱言，時任第三戰區轄下川軍第23集團軍副總司令的郭勳祺，當時正在重慶，就對徐永昌直言：「（第三戰區）軍人不研究作戰，而研究走私，又謂前線軍民花柳病盛行，此大可畏之事。」<sup>125</sup> 1942年11月，浙贛會戰告一段落，蔣的一封總結戰役得失的電文，更具有極高的代表性：

（一）第三戰區軍事長官憑藉勢力，控制一切交通工具，實行走私，其所稱嚴禁走私而遭法辦者，僅為下級幹部及小公務人員。……當浙贛一帶戰事失利時，商人搶運物資急如星火，而本站（永康、金華、蘭谿、衢縣等）司令更乘機大事敲詐，繼則因交通工具缺乏，結果使商人全部貨物完全損失，加以部隊長官藉口徵發車輛，中途劫奪商車委棄商人貨物，而搶運私人物資，種種不法，不勝枚舉。

<sup>122</sup> 陳誠著，林秋敏等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一）》（臺北：國史館，2015年），1942年6月13日，頁374。

<sup>123</sup> 「蔣中正電顧祝同指第三戰區內奸宿女犯剋扣囚糧人員不立即槍決僅主要負責人撤職記過了事如此軍紀廢弛如何善後」（1942年10月23日），〈領袖指示補編（十六）〉，《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6-114。

<sup>124</sup> 「蔣中正電顧祝同如不查究爾等即任意縱奸犯法實痛心嘆息不置」（1942年11月12日），〈領袖指示補編（十六）〉，《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6-121。

<sup>125</sup> 徐永昌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6冊，1942年9月2日，頁469。

- (二) 第三戰區軍事政治設施上極欠公允，秉公守法者妻兒啼饑號寒，貪贓枉法者飛黃騰達，一般幕僚人員極不健全，生活與行動頗多奢侈浪漫，殊違抗戰精神。
- (三) 金蘭撤守贛東撤退時，部隊官兵因生活壓迫之痛苦與外界之吸引，其沿途逃亡極夥，為數超過作戰時之傷亡若干倍。<sup>126</sup>

從蔣中正對於第三戰區的懲治方向，集中在違反軍令、不遵軍紀及人謀不臧等問題上，顯然他認為第三戰區是不需要為戰略、戰術的失敗負責的。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歷來研究者所言，國軍統帥部的集權式領導，過度干預下級單位的作戰部署，使得前線將領無從發揮自身的指揮能力，更讓基層失去自主及應變能力，不但難以培養有為將領，甚至養成「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依賴心理。<sup>127</sup>

## 柒、代結論——浙贛會戰的影響

結束浙贛會戰的戰鬥後，參戰日軍咸認為此役遭遇的最大敵人不是國軍，而是梅雨季的暴雨侵襲與浙江境內多山的地形。浙贛會戰期間適逢浙江省六十年一遇的大洪災，嚴重阻礙了部隊的行進，潮濕給日軍士兵帶來惱人的疱疹與瘡癩，以及浙東崎嶇不平的道路，都讓日軍吃足了苦頭。<sup>128</sup>

武漢會戰是中日戰爭及國府戰時體制的一大分水嶺，武漢會戰前，戰爭還未形成持久戰的態勢，但在武漢會戰結束後，軍事委員會撤退至重慶大後方，鞭長莫及，戰爭演變為持久戰，國軍的戰略構想是以時間及空間拖垮日軍，1940年初冬季攻勢作戰結束後，更徹底放棄主動出擊的念頭，蔣中正將所有的軍隊散到各地駐守，國軍的心態從野戰部隊變成駐防的守備軍，於是變得愈來愈趨於保守，保存實力成為首要考慮。根據齊錫生的看法，只要一支部隊長期在一個固定地點

<sup>126</sup> 「蔣中正電願祝同痛責第三戰區軍紀渙散」（1942年11月10日），〈領袖指示補編（十六）〉，《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6-119。

<sup>127</sup> 張瑞德，〈遙制—蔣介石手令研究〉，頁37。

<sup>128</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華中方面軍作戰「派遣軍作戰」（一）》，頁147、295、297。

駐紮，就會出現軍紀敗壞現象，而且時間越久，腐化和頹廢的程度就越高，這個長期性的腐蝕過程，最終感染了絕大多數的國軍部隊。<sup>129</sup>

浙贛會戰期間任職第六戰區司令長官的陳誠，應是國軍高層中最早洞悉國軍此一保守心態之人。陳在1942年初即提到，隨著戰事膠著，各前線戰區避戰情況逐漸浮現：「原戰區序列之精神在守土有責，故以地區為名，惟行之已久，弊端百出，似應改為以反攻收復失地為主，以提高攻擊精神，並打破一切弊端。」<sup>130</sup>更在1942年12月18日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林蔚，囑其將此一現象轉達蔣中正，務必扭轉國軍不思進攻、只求固守的作戰態度：「欲求反攻勝利及奠定建軍基礎，首須調整戰鬥序列。考以往歷次反攻，未能確收戰果者，其原因固多，而前方指揮不統一，協同不良好，則為主因。……致使敵人在我戰區自由抽調部隊，集中力量，以攻擊我某一戰區，我則互相觀望，完全被動，至可慨嘆。且戰區名稱，初意重在守土有責，完全為一防守性之措置，相沿日久，養成一變相防區之觀念。今當戰略改變準備反攻之際，自應依照反攻目標，重定適合要求之戰鬥序列，既可轉變將領防區心理，提高反攻精神，復可收指揮統一協同一致之效。」<sup>131</sup>然而，陳誠在評價自己於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任內繳出的成績單時，也是以同樣保守的標準自許：「在軍事方面，宜昌以西，敵人未得寸進，達成拱衛陪都的責任，差不多可以交代下去。」<sup>132</sup>如果連國軍將領中最具進取意識的陳誠，都是以未失寸土做為達成任務的基本標準，更遑論苛責其他將領。

從淞滬會戰至浙贛會戰前夕，第三戰區至少已有三年時間，沒有大規模的戰事出現，轄下軍隊不但戰力不佳、軍紀亦不堪聞問。浙贛會戰中日軍的三個作戰目的：1.擊潰第三戰區國軍部隊的有生力量；2.摧毀浙江省內的空軍基地，以阻止美軍利用空襲日本本土；3.奪取鐵軌、螢石等重要戰略軍需物資，均在沒有遇到太大阻礙下達成。第三戰區在蔣中正的指示下，採取避免硬碰硬的正面迎戰，將主力部隊藏匿至日軍進軍路線外的兩側山區，伺機偷襲、騷擾、破壞日軍後防

<sup>129</sup>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頁6。

<sup>130</sup> 陳誠著，林秋敏等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一）》，1942年4月13日，頁367。

<sup>131</sup>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與友人書》，上冊（臺北：國史館，2009年），頁229。

<sup>132</sup>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160。

與補給，使日軍首尾不能相顧，但國軍受限於訓練、組織與體質緣故，對隱蔽出擊戰術一知半解的第三戰區部隊，從作戰過程來看，顯然是隱蔽有餘、出擊不足，以致落個遭人譏諷消極避戰的負面標籤。此役由於日軍很快地收縮回原陣地，國軍對外宣稱收復所有失土，帳面上看來損失不大，實則對外掩飾了浙贛會戰作戰不力的敗績。

浙贛會戰還有一個素來遭忽略的轉折，在此役前後的戰力天平中，除了日軍外，還有誰是這場戰役的獲利者？日軍在浙贛會戰中攻城掠地，幾乎占領了浙東全境及浙贛鐵路沿線所有重鎮，然而，中共地下黨人充分掌握國軍退出防地、權力真空的機會，率先於1942年6月在浙東建立會稽山游擊根據地，並成立一支南進支隊，轉戰並擴大至諸暨、義烏、東陽、浦江、嵊縣等地，擴大鞏固了抗戰時期中共19個抗日根據地之一的浙東抗日根據地。<sup>133</sup> 中共在浙贛會戰中的角色，可謂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兩年後的一號作戰，中共同樣向國軍撤退地區大肆擴展，甚至越過隴海路及長江，向兩湖、浙江及廣東進軍，一舉扭轉原本國共之間的劣勢。<sup>134</sup>

抗日戰爭深刻改變了中國的國家、社會與人民間的三角關係，尤其是社會供給概念的顛覆。傳統中國的王朝政權很少直接負責提供日常福祉予人民，如同擊壤歌所言：「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帝力與我何有哉！」直到1937年前國民政府的施政作為，仍甚少直接影響到下層人民。抗戰改變了群體與個體、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連，戰爭迫使各個政權必須努力汲取資源，國家對人民的要求擴大，人民也期待政府應該要保護百姓。重慶、延安與南京都在競爭人民的支持與效忠，在這個競賽過程中，中共獲得了最終的勝利。面對日軍的強力進攻，國軍鑒於雙方兵力的懸殊，採取隱蔽出擊、伏擊襲擾的作戰方式，這或許是不得不然的做法，但各戰區國軍高層長期疏於與地方組織建立聯繫管道，幾乎是上下隔膜、不通聲息，連阮毅成這樣身任要職的人員都對第三戰區的計畫一無所悉，更遑論一般民眾。尤其是國軍為阻撓日軍進軍，所不得不採取的焦土作戰策略，從破壞機

<sup>133</sup> 浙江省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浙江省檔案館編，《浙東抗日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頁6-11。

<sup>134</sup>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頁345-346。

場設施到全面性地破壞公路，然而從浙贛會戰的過程中來看，第三戰區為了執行焦土作戰，過度動員及役使平民百姓。黃紹竑、阮毅成等人都提到他們在逃難過程中，還得要負起破壞公路之責，戰前浙省所建的3,717公里公路，到了戰爭後期只剩759公里。<sup>135</sup>

此外，日軍在打通浙贛線後，主要作戰目標即轉變為奪取浙贛線上的鐵軌資材等戰略物資，據日方第13軍工兵單位的統計資料，總共從浙贛沿線倉儲庫存及鐵軌拆除工程下所奪取的重鐵軌計46,276根、輕鐵軌計20,066根、火車頭等各式車輛45輛、枕木計24,778根，螺絲、鉚釘等各式工程用具合計634,249個，其他自浙江境內所掠奪的各種軍需物資，也都有詳細的統計數據。<sup>136</sup>然而，這些原本屬於國軍的軍需物資，對於資源貧乏的國府來說，應更是彌足珍貴、不容損失，但在國軍自己的戰爭損失調查紀錄裡，卻是語焉不詳，國府很可能根本不清楚自己損失了多少物資。這或許也是焦土作戰另一個不容易被察覺到的負面影響，由於焦土作戰的本質就是自我破壞，至於是被自己破壞還是被敵人破壞，從結果來看，似乎也沒有太大差別。第三戰區的焦土作戰，顯然沒有經過科學的判斷，焦土政策的目的何在？要破壞到什麼樣的程度，才能阻止日軍進軍或避免資敵？要控制在怎麼的破壞範圍，才不至於得不償失、無法彌補？這些質疑都對當時仍處於農業社會的國府來說太過苛求，但更殘酷的現實是焦土作戰對於日軍的打擊有限，對自己僅有的一些基礎建設與民眾身家財產卻傷害至大。而在近代戰爭越來越形成總體戰的過程中，廣大基層民眾的支持必不可免，從浙贛會戰的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到第三戰區國軍對於保護一般百姓身家性命財產的責任過於輕忽，一葉知秋，這終將會對國民政府造成嚴重的傷害。

<sup>135</sup> 黃紹竑，《五十回憶》，中冊，頁475。

<sup>136</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華中方面軍作戰「派遣軍作戰」（一）》，頁386。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臺北，國史館藏）  
〈莫與碩〉。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全宗》（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第三戰區工作報告、第三戰區第四次軍政座談〉。
-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一年〉。  
〈八年血債（五十）〉。  
〈八年血債（五十一）〉。  
〈交擬稿件—民國三十一年一月至民國三十一年二月〉。  
〈交擬稿件—民國三十一年七月至民國三十一年九月〉。  
〈交擬稿件—民國三十二年一月至民國三十二年三月〉  
〈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  
〈領袖指示補編（十四）〉。  
〈領袖指示補編（十六）〉。  
〈籌筆—抗戰時期（四十八）〉。

### 二、史料彙編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
-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7、48冊。臺北：國史館，2010、2011年。
- 浙江省檔案館編，《浙東抗日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1年。

### 三、日記、文集、自傳、口述歷史、回憶錄、年譜等

- 丁治磐，《丁治磐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輯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 全國政協《閩浙贛抗戰》編寫組編，《閩浙贛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
- 何成濬著，傳記文學雜誌社編輯，《何成濬將軍戰時日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
-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臺北：國史館，2004年。
-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友人書》。臺北：國史館，2009年。
- 阮毅成，《八十憶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1年。
-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
- 徐永昌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 張朋園、林泉、張俊宏訪問，張俊宏紀錄，《於達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
-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蔣介石與我一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
- 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曹聚仁回憶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
- 陳誠著，林秋敏等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臺北：國史館，2015年。
- 黃紹竑，《五十回憶》。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年。
- 劉鳳翰、張力訪問，毛金陵紀錄，《丁治磐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 《蔣中正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 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年。

### 四、專書

- 王建朗，《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
-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華中方面軍作戰「派遣軍作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

- 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軍事作戰》。臺北：國史館，2015年。
- 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臺北：古楓出版社，1986年。
- 徐復觀，《徐復觀雜文—憶往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浙贛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66年。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湘贛地區作戰（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年。
- 張明金、劉立勤，《國民黨歷史上的158個軍》。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
- 曹劍浪，《國民黨軍簡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
- 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
- 郭岱君主編，《重探抗戰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
-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
-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
- 蔣緯國，《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臺北：黎明文化，1978年。
- 顧祝同將軍紀念集編輯小組編，《顧祝同將軍紀念集》。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8年。
- Eastman, Lloyd E.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Eastman, Lloyd E.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Fairbank, John K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1912-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Peattie, Mark,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f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Schoppa, R. Keith. *In A Sea of Bitterness: Refuge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五、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文正再，〈論浙贛會戰及其影響—兼論中國戰場戰略反攻機遇的喪失〉，《萍鄉

- 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6年第1期（1996年2月）。
- 張力，〈從決戰到棄守：浙贛會戰衢州戰役蔣介石的抉擇〉，收入陳紅民主編，《中外學者論蔣介石》。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
- 張瑞德，〈遙制—蔣介石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2005年10月）。
- 楊菁，〈寧紹戰役和浙贛會戰始末〉，《浙江檔案》，2005年第6期（2005年12月）。
- 楊維真，〈長沙大火事件的調查與檢討〉，收入吳淑鳳等編，《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臺北：國史館，2012年。
- 劉元孝，〈笕橋初戰紀實〉，《中國之翼》，第3輯（1992年4月）。
- 劉善慶，〈抗戰中期一次典型的消極避戰之役—浙贛會戰述評〉，《安徽史學》，2001年第4期（2001年8月）。
- 樓子芳、袁成毅，〈浙贛會戰：中國為盟軍承受的一次巨大報復〉，《浙江社會科學》，1994年第6期（1994年12月）。
- 賴繼年，〈浙贛會戰新探〉，《抗日戰爭研究》，2011年第1期（2011年2月）。

## 六、學位論文

- 賴繼年，〈浙贛會戰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